

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

王 丰

【内容提要】在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新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与蔓延全球的低生育率同时共生。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决定了低生育率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逆转。在很短时间内走完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过程的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化与家庭变化的挑战也颇为艰巨。经济全球化与低生育率的大势要求对人口变化及其后果有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 全球化 人口政策 低生育率 人口转变

一、世界人口的两次历史性转变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两个最具有历史性的变化。一个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另一个是正在蔓延全球的生育率下降。这两个变化在微观水平上彻底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与生活,在宏观水平上彻底改变了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曾是全球对人口爆炸充满恐惧的年代。尽管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距此近200年前(1798年)就已经断言食物增长将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警言如果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人类将无法避免更多的战争、瘟疫与饥荒,但他的预言一直到20世纪后期才受到世人的真正重视。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厄瑞驰(Paul Ehrlich)《人口炸弹》一书把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生动地引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入了全球议程。

国际社会几十年前对人口爆炸的担心完全是有其根据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元年，全球人口规模用了一万年才从约6百万增加到约2.5亿。在这一阶段世界人口的期望寿命在20岁左右，人口年增长率约为万分之零点八。按照这种速度，人口规模每八千多年才翻一番。马尔萨斯出版其《人口原理》小册子时，世界人口规模已扩大至8亿人左右。当时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约在万分之七，比公元前的增长速度加快了10倍。不过，按此速度，人口规模也每一千年才翻一番。而当保罗·厄瑞驰的《人口炸弹》问世时，世界人口已经增长至37亿，期望寿命增至40岁以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已达到2%左右，为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时的人口增长速度的近30倍。按此速度，人口规模每翻一番仅需40年左右。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不难想象，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无限增长下去，地球很快会变得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然而，现在看来，如此令人恐惧的人口爆炸仅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很短暂的篇章，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篇章，也是一个由于人类社会本身进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导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20世纪这100年中，世界人口的期望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由30多岁增至近60岁，成为20世纪人类最具真实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进步。

人均期望寿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延长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对于个人来说，寿命延长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更是人生质量的提高，人生意义的改变。更健康、更长的生存时间使人有更多的机会在各个方面发展自己。长寿可以使人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创造、享受人生、积累知识与经验。死亡率下降把个人尤其是妇女从曾经是不休止的生儿育女的人生中解脱出来，直接成就了妇女解放与妇女地位提高。长寿也使得社会对个人生命的价值更为珍惜和尊重，因为人生已离死亡厄运的随机性越来越远。生存和长寿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是运气，而是给定。

对于家庭与社会来说，更多的人可以存活到老改变了家庭和社会组织。人口死亡随机性的大幅度下降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长远规划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不能不归功于人均期望寿命延长这一伟大历史进步。换句话说，死亡率下降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改进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原因。

在现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之前，由于无法应对相当高的死亡水平，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有足够高的生育水平，以保证人类不至于绝种。^[1]而当近百年来的世界人口总数居多国家中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时，这些国家历史上与高死亡水平相应的高生育率水平却没有以同一速度迅速下降。生育率下降滞后与死亡率下降，而不是生育率水平上升，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剧增。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性的人口爆炸，是人类进步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后果。

然而，世界历史上这次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将很快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次人口转变，即人口老化与人口减少的新的挑战。20世纪后半叶，步西欧国家之后，世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幅度生育水平下降。1960—2006年，世界人均GDP水平上升了2.4倍，与此同时，以总和生育率衡量的平均生育水平由1962年的5.4下降到2006年的2.5，减少了54%。^[2]

这次全球性的低生育率大潮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还是人们料所未及的。在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关注点是把人类推向末日的“人口爆炸。”目前，尽管世界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度地减缓。更重要同时也更出乎预料的是，人类可能会成为自身控制人口增长过分成功的牺牲品。以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作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标准，时至21世纪之初，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生活在人口再生产低于更替水平之下的国家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久将步日本与俄罗斯等大国之后尘，进入人口老化与人口减少的历史行程。^[3]

在全世界竭尽全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想过生育率会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更没有预想过人们会不愿再要孩子。不难想象，如果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不断持续下去，有一天人类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在没有大规模的战争、饥荒或瘟疫条件下所产成的人口减少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人口规模缩小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2000年。

[2] World Bank, 2008.

[3] Morgan, S. Philip and Miles G. Taylor, "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6, 32: 375~399.

二、全球化与低生育率的挑战

比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更为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谷底在何处，更不知道依靠什么政策与手段才能诱导、鼓励甚至是强迫人们生孩子。可以说，这种控制人口的成功与人口趋势的逆转到来得如此之快，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

国际上对于低生育率的解释，既有人口学方面的，也有社会经济学方面的。人口学的研究集中在对产生低生育率的时间因素的分析，即在多大程度上生育水平浮动或下降是由于人们推迟结婚生育造成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放弃生育带来的。^[1]研究表明，在很多人口中，推迟生育可解释生育水平下降的一部分。但这里有待回答的是，这种推迟会不会成为永久性的，即转换成不可弥补的生育数减少。

对于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学解释可大体分为两类：结构性或压力性的，意识形态性或主观能动性的。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经济压力和各种限制条件使得年轻人无法生育。对此，英国 *Population Studies* 杂志在 2003 年有专题辩论。^[2]持这种解释的人也指出，尽管在许多国家社会调查得到的人们理想的子女数多为 2 左右，实际生育水平却远低于此，说明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想生而没有条件。而另一方面的解释，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为旗帜，则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现代人生活观念发生的根本变化，即人们对婚姻家庭观念的淡化甚至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注重个人发展与满足的个人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使用不同社会的大量调查数据表明人们一系列与生育有关观念的变化，诸如对家庭的看法，对婚前性行为看法与经历，以及对子女在生活中地位的看法。^[3]

生育率为什么在降低到更替水平后不断下降？是什么力量在驱动低生育率？这里的答案要从低生育率的大国际环境，即经济全球化中去找。外部的经济压力与内

[1] Bongaarts, John and Griffith Feeney, "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8): 271~291; 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0 年第 1 期。

[2] Caldwell, John C. and Thomas Schindlmayr, "Explanations of the fertility crisis in modern societies: A search for commonalities", *Population Studies*, 2003, 57(3): 241~263.

[3] van de Kaa, D.J.,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1987, 42: 1~57; Lesthaeghe, Ron,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 interpretation", in Karen O. Mason and A. M. Jensen (eds.),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17~62.

部的观念变化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地区不同个人推迟甚至放弃生育的现象。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是互斥的。更重要的是，再生产不可能与生产分割开来，而应放在同一个国际大环境下加以分析认识。

20世纪末最后一轮的经济增长与低生育率在全球的蔓延是在同一政治经济环境下产生的。这一大历史环境便是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化。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议论和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却像是两列并行的火车，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生产和再生产真是互不相干的吗？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近30年来，全球化成为了最时髦最常见的囊括万物的词汇。这一说法的兴起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瓦解与经济市场化的蔓延有明显关系，因为世界似乎在一种经济制度下大同了，资本、劳动力、市场似乎可不再受国界的限制了。然而，全球化这一最流行的词汇也是最受争议、最不确定的说法。^[1]不管全球化是否是新现象，也不管怎样去定义它，并对它作出何种价值判断，近年来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变化有以下五个有共同性的特点，而这些在生产领域内的特点与人类在再生产方面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全球化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和对社会中间阶层的压力加大。^[2]随着跨国集团公司势力扩大与资本、金融、贸易流通加速，一个后工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在这个市场上，国际资本与地方劳动力短刃相交。国际资本流动性加大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更多不稳定的服务性的工作产生了，诸如非正式工、自我就业者与短时工。与工业化时代的大制造业相比，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服务行业中工作品种日益多样化，报酬也日益不均等。同是在服务行业，从事金融或高科技的人员与卖快餐和从事零售人员的收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所有在服务业工作的人来说，工作不稳定成为了常态。低收入人数的增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负担住房、幼托与子女教育的费用。对于他们来说，最宝贵同时也是最缺乏的是时间。

随着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和经济资源的关系形成了一种U字型，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育水平高于人数居多的处于分布中间的人们的生育水平。对于那些处于低端的人来说，尽管他们承受的经济压力最大，由于他们所处地位，他们可以丢失的也最少，也即经济学中

[1] Mittelman, James H.,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iglitz, Joseph 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2] Alderson, Arthur and François Niels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U-turn: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16 OECD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2, 107(5):1244~99; Cornia, Giovanni Andrea. (ed.),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an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所说的机会成本最低。对于那些处于收入高端的人来说，他们的资源可以允许他们不为个人与子女的住房、教育、就业担心，甚至可以让夫妇一方放弃工作全职生育女。最受压力的是那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而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中间阶层人数增多与他们平均占有资源水平降低，社会的整体生育水平也就越低。

新一轮全球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和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加大。随着低端制造业工作的消失，以及在新技术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就业报酬的增加，能否在这些高收入行业里找到工作，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与接受专业培训的资历。为了能赶上不断更新的技术变化从而能保证工作的稳定与收入增加，在高竞争环境下年轻人对自己以及自己后代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得不高度担忧。年轻人为了追求教育、保证就业、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生育。许多人在工作生活比较有保证而再安排生育时，发现怀孕生育的最理想生物时机已被错过。年轻人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以及对子女教育费用和时间投入的担心，也成为他们结婚育子的重要考虑。

近年来全球化的第三个特点是政府对社会服务的削减以及对个人期望的加强。尽管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个人成就与满足感在人生意义中的重要地位——在人类历史尤其是西方社会历史上由来已久，^[1]我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新的变种，即“制度化的个人主义”。^[2]这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物，因为“福利国家中的主要权利与待遇是为个人而不是家庭所制定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权利与待遇的前提假设是就业。就业意味着要接受教育。就业和受教育都假使人是能流动的”。^[3]近年来，医疗、养老等方面服务的不足以及各国政府对这些方面开支的缺空乃至削减比比皆是。^[4]社会安全网的削弱导致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从而也会影响年轻人的生育计划和行为。

全球化的第四个特点是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强。资本追随着利润，而劳动力跟随着资本。资本流动到哪里，劳动力就流向哪里。随着资本流动性加大，劳动力的流动性也随之加大了。人口流动对于婚姻和生育也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寻找配偶以及维持稳定婚姻关系的困难，长时间的夫妻分离，以及由于流动给生

[1] Macfarlane, Alan,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Macfarlane, Alan,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2] Beck, Ulrich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3] Beck, Ulrich,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9.

[4] Esping-Andersen, Gøsta,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cDonald, Peter, "Sustaining fertility through public policy: the range of options", *Population (English edition)*, 2002, 57(3): 417~446.

活带来的其他不确定性。

全球化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五个特点是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以追求物质生产效率为中心的全球化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主义文化。对物质产品无止境的追求和对物质产品无限制的占有感代替了家庭及养育子女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与人生意义。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而来的也是以个人主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观念。“选择、决定、把自己塑造成自己人生历程的作者”以及“个人身份的创造者”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中心标志”^[1]。在人口再生产领域内，各国政府与诸多国际组织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投入了难以估量的资源，造就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反生育的新文化——多生育子女被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表现。

以上这些全球化的力量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孕育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对人口再生产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所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用社会学家贝克（Beck）的描述，过去那种“简单的、线性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工业现代化”已被一个远为复杂的过程所替代。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所面对的是同时应付全球化、个人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以及全球性风险（如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带来的挑战。相对于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或贝克称之为的第二个现代化，人们对第一个现代化更容易理解与适应，因为当时的“集体生活方式、进步与可控制性、充分就业与剥削”都是在民族—国家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一种新的经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一种新的个人生活。这个时代我们崇尚的是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是“非正式经济部门与劳动力灵活化的扩张，对经济部门中诸多领域与工作关系法律制裁的放松，国家合法性的丧失，失业与不充分就业增加，跨国公司干预加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与犯罪”。^[2]

在人生所有需要做出承诺与担负责任的决策中，很少有几个能和生儿育女的重大决策相比。在现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个人要对生育子女的风险与代价进行仔细的思考。在决策由家庭转向了夫妇、甚至是个人的前提下，对风险的计算更为显得重要。有时这意味着推迟结婚生育，有时这可能意味的是完全错过机会。不确定性提高了生儿育女的代价，再生产的不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日渐趋同。

[1] Beck, Ulrich,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9.

[2] Beck, Ulrich,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3.

三、中国的选择

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的两次人口转变。由于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性，中国所面临的选择也与众不同。中国人口转变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人口转变的速度快，第二是国家政府对个人生育的强制性干预。

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与几个主要欧美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所需时间减少了50%。历史上西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以总和生育率为指标）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子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个左右用了约75年的时间。与其相比，中国所需时间仅为30年左右，也是一半时间不到。

中国的这种快速的人口转变不仅意味着在短时间内的快速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更快的人口老化过程。例如，中国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加到1964年的7亿仅用了10年时间。而随后从7亿至8亿、从8亿到9亿各用了5年或不到5年的时间。正由于如此之快的人口增长，才会有30年前开始实行的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生子女政策。然而，随着人口转变的加速完成，人口转变的后果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接踵而来。中国60岁以上老人的总数将由目前的1.65亿剧增到2020年的2.4亿，2030年的3.4亿，占人口总数的25%。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是不争的事实了。经过十多年对各种数据的反复分析研究，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是中国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进入到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的新阶段。^[1]除了城市人口中三十年来普遍只生一个孩子之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与流动人口也选择只生一个孩子。而生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妇越来越少。加总之后，全国平均生育水平仅为每对夫妇1.5个子女左右。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已造成小学入学人数的剧减。1995年全国小学录取新生数为2530万，2008年仅为1670万，减少了三分之一。由于出生数减少和学校合并的原因，1990-2008年间全国小学学校数减少了60%。

在中国的低生育率和中国经济同步跨入了21世纪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许多人对人口的认识还停留在三十甚至是四十年前“人口爆炸”的水平上。有些人还是把20年甚至是30年以前在某个边远乡村看到有人生了三个或更多子女等同于现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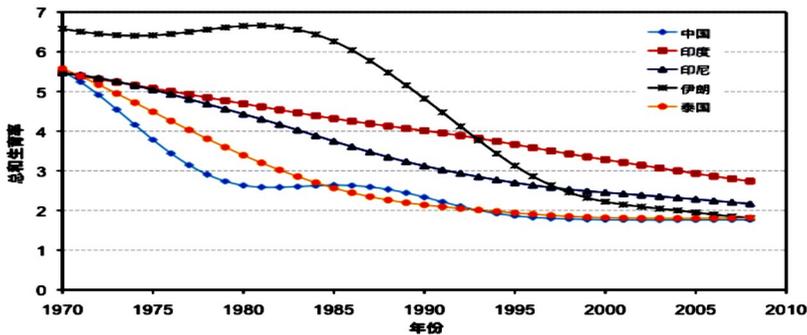
[1]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0期。

国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

由于中国三十年来实行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是政策人为造成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远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国1990年就已经开始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政府成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近年来在全球化环境中中国经济制度改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应被低估。如图1所示，在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生育率同样下降到了更替水平。1980年代后，泰国的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相差无几。伊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等国家也呈类似的生育率下降趋势。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解释地区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或是个人生育意愿的不同，政策都远远不是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因素。^[1]反之，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低生育率的因素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低生育率。作为处在全球化最前列的中国，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与其他地区的人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图1 中国与几个国家生育率变化趋势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亿万家庭的长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人口在21世纪将面临负增长已经不是假设，而是定势了。^[2]中国社会马上要面临

[1] 顾宝昌、王丰：《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Zheng, Zhenzhen, Yong Cai, Wang Feng, and Baochang Gu,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Childbearing Inten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09, 5(3): 329~347; Cai, Yong, “Social Forces behind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Government Policy 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2] 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的人口老化是劳动力的老化。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此定义为20~60岁）的总数仍将颇为可观，但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度地萎缩。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过去十年间，20至29岁年轻劳动力人数已减少了14%。未来20年将进一步减少17%。不仅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得到及时扭转，这种劳动力老化的趋势会不断加剧。对仅仅是担心就业的决策人来说，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这个年龄组的新生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创造力的。这部分年轻人口也是消费力最强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对劳动力供应，同时也对消费需求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的是新结婚夫妇对数的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的减少，对所有与青年人有关的消费需求的减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也会使他们人均负担的养老费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人口老化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动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20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至25%。^[1]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早期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贡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已耗尽并将为经济增长拉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而中国正在步这些地区的后尘。

中国社会由于低生育率带来的最大负面效应还不是今后劳动力的老化与萎缩，而是只有一个子女的亿万户家庭。过去的三十年中，很大程度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中国已产生了1.6亿独生子女，也即1.6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国总家庭户数的约三分之一多。若现行的低生育率不能及时扭转，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将成为永久性的独生子女家庭。至21世纪中，60岁妇女中将有一半人只有一个子女。子女对父母、家庭的重要性远不止于他们可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精神支持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根本作用。这些作用是任何政府支持辅助项目所无法弥补的。家庭为社会之本。中国如此之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将对这些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的风险来源。

[1]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王丰、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3期；王丰：“人口红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

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形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许多欧洲国家及东亚各国，低生育率已经开始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给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带来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将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同时，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并非易事。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而至今为止这些鼓励生育政策奏效的还寥寥无几。

对低生育率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发现是人们认识的滞后。但在许多国家中，对低生育率的认识以及政策应对都有一个时间差。在亚洲一些最先步入低生育率的国家地区，一般至少滞后了1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政府的控制人口的政策才开始转向为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也不例外。尽管中国的生育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低于更替水平，然而对这一转折性的变化的认识是缓慢的，甚至是十分困难的。这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数据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相似之点在于，我们都迟迟不愿相信生育率会降到这么低，同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认识人口惯性与人口变动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加。对于不了解人口变化内在规律的人来说，中国似乎应在人口增长停止时再重新考虑公共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讨论与调整。然而，如果真把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口总数是否还在增加的基础上，则完全忽视了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即人口惯性。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与开始不久的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最大的转折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性人口增长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的人口负增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20世纪成功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作为对这一成功付出的代价，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是人口负增长。作为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同时快步加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的人口大国，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丢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而且是更深层更持久的挑战。▲

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 若干认识误区

蔡 昉

【内容提要】本文概括相关经验研究结果证明,诸多关于中国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传统观念包括:(1)人口众多是经济增长不利因素;(2)计划生育造成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3)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4)中国仍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5)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二元经济终结;(6)承认人口新趋势导致对就业的忽视。本文指出,走出这些认识误区,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形成恰当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 认识误区 人口红利 二元经济 刘易斯转折点

“思想总是先于事实。全部历史事实自始至终都作为规律在人的头脑中预先存在。每个规律依次由居于支配地位的环境所造就,而自然的局限性,使得每一时刻只有一个规律在发挥作用。”

——爱默生《论历史》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特征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许多影响到政策制定的认识,都来自于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官员的人口观。但是,对于这个国情,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认识误区,妨碍了我们根据国情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做出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基于作者本人的长期研究结

果，本文精心挑选若干关于中国人口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几个广为流行的观点，通过概述新的理论进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予以剖析并澄清谬误。

一、人口众多是经济增长不利因素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从这类视角出发，许多结论如人口众多或者人口增长快，造成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就业机会不足，阻碍经济增长从而社会发展，大多具有想当然的成分。总体来说，这类观点被认为是马尔萨斯传统，整部经济史都没有证明其正确性。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对人口增长可以做出积极的反应，这样，技术变迁、经济增长不仅能够解决人口增长遭遇的资源问题，从而人口增长从来不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现象，甚至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观点没有明确地给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解释。总之，相当长的时间内，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答案。^[1]

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2]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换句话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字型曲线变化之后，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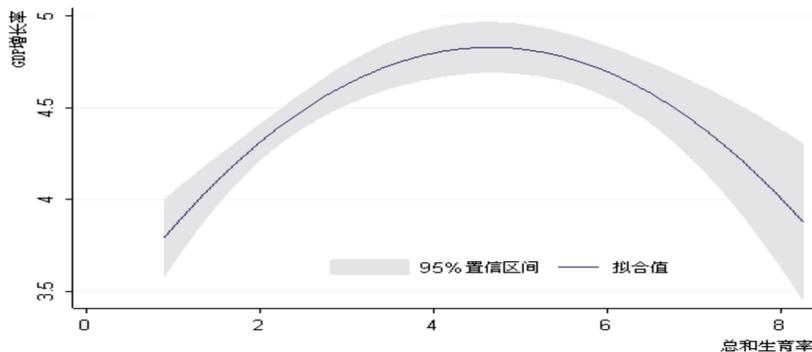
[1] 蔡昉、张车伟等：《人口，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Williamson, Jeffrey,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6244, 1997.

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上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的）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上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的）稳态水平上。相应地，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GDP年增长率介于-51%~106%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的复杂性，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只观察GDP增长率介于0%~10%之间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的曲线。因此，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的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关系，在图1中画出了GDP增长率的拟合值，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图1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经验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绘制。

图1直观地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型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

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结论是：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有互为因果的促进关系。^[1]

二、计划生育造成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2]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30年的增长奇迹，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亚洲四小龙，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6.8%，与世界老龄化平均水平相同，而200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照官方汇率计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3%。虽然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一个适度的加速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未富先老”产生的缺口（即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也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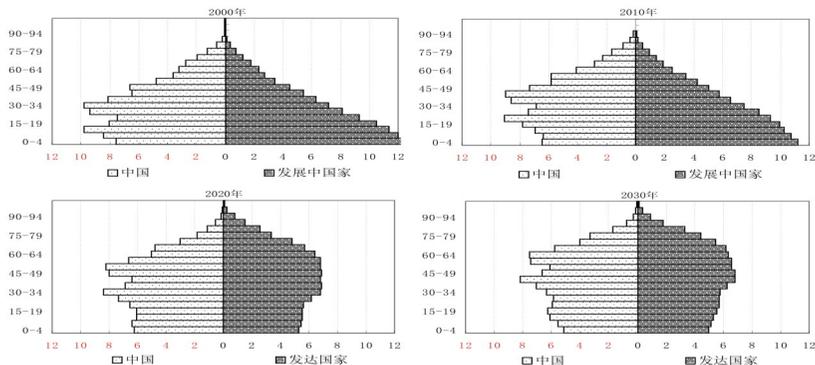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上，因此，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相应地，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

[1]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2] 林毅夫：“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载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主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如图2所示，如果中国未来的参照系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则“未富先老”特征便消失了。

图2 依靠经济赶超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2009.

人口结构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出生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从生物学上，这个比例在103-107之间比较正常。我们观察0-4岁人口组的性别比可见，1990年为110，2000年为120，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123。关于这种不平衡的性别比有两个争论焦点。一是这个现象是否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二是这种失调的婴儿性别比是否会造成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根据目前的出生性别比预测，2020年中国25-35岁男子将比20-30岁的女子多4000万人左右，按照中国习惯的婚姻年龄差别，这些人将找不到合适的配偶。

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是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从而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普遍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老人对男孩的依赖，作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社会经济原因。很多研究者建议通过宣传教育，改变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传统观念。尽管这种观念的改变是有意义的，但是却不能解决养老的问题。因为在子女和年老父母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养老负担的确成倍加重。假设一对夫妇仅仅具备赡养一方父母的能力，同时又没有儿子养老的传统习俗，儿子养老或者女儿养老成为随机的，养老资源仍然不足。而由习俗决定的儿子养老模式，实际上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恰好符合这个随机原则。

如果说出生性别比的偏好与养老保障问题相关，其因果关系不是子女哪一方养老的问题，而是第一，社会养老资源不足、覆盖率低下，导致对子女数量的需求，进而转化为对儿子的需求；第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导致其养老能

力不足，从而诱发出对男孩的偏好。因此，在这种由于资源不足或能力不足产生的养老危机诱致出性别偏好的情况下，靠转变“养儿防老”的观念不能解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初期，随着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扩大，以及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企业对女性在劳动供给上有较低的评价，或者干脆具有歧视女性的倾向。如果人力资本和其他个人特征不能解释工资差异的全部，则存在劳动力市场歧视。例如，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显示男女劳动者在就业中获得的工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根据一项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在现存的性别工资差异中，有不到5%是男女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差异造成的，其余95%以上是由于一些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性别的歧视。^[1]

因此，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个矛盾的治本举措是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根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由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存在，进一步诱导出家庭对女孩教育的投资偏好低于男孩，因此，随着教育层次提高从而教育成本的提高，家庭对女孩的投资倾向于减少。^[2]在贫困家庭数量增加，家庭预算趋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因此，关注和干预贫困家庭女孩的受教育问题，是避免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重要内容。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由于许多改革只产生一次性增长效应（如农业中的家庭承包制），而且改革效应也要通过具体增长源泉实现，所以经济学家还要探寻30年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许多人都同意，因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的方向变化，是一个重要源泉，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我们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的27%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这个估计的系数是：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3]

那么，如果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转为上升，是不是上述系数仍然成立呢，是

[1] 王美艳：“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2] 研究表明，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男女入学率的差距逐渐扩大，到了高等教育层次，差距可高达一倍左右。参见蔡昉、王美艳：“妇女劳动力供给特点与教育投资”，《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3] Cai Fang and Dewen Wa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5.

不是形成与人口红利相反的结果，即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2013年是一个人口转变的转折点，此后抚养比将迅速提高。总之，需要回答的是：过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源泉的人口红利是否就此枯竭呢？未来经济增长源泉何在呢？

固然，丧失人口红利意味着增长源泉的转变，但是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不存在了，未必就不能继续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及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通过建立起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深化教育、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挖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源泉。即使今天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或者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在某些方面仍然只开采了一半，仍然有挖掘的潜力。

我们知道，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形成民工潮，相应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作为人口红利的体现，表现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充足供给，扩大了的城市化消费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社会保障需求和积累贡献，伴随人口城市化的土地开发，等等。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性特征，这方面最有潜力可挖，另一半人口红利依然丰富。

过去30年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年平均3.2%，过去20年为2.9%，而在过去10年为3.2%。这个速度不可能长期持续。首先是从世界性的规律看，我们属于超常规城市化速度。国际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应该在0.8%~1.6%之间，而我们在2%~3%之间。其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日渐减速，预期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事实上，过去几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但是，过去的城市化只是半截子城市化，是居住超过6个月的常住人口增加导致的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例如，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是，按照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两者之间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

虽然，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因为它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的转换。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这种就业转换对改革开放期间GDP增长率做出了21%的贡献。^[1]但是，仅仅就业转换而没有居民身份的转变，这种半截子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和城市建设需求，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对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积累等方面的贡献，仍然不足，因此呼唤完整的城市化。可见，通过把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可以发掘另一半人口红利。简单地说，即使城市化率提高速度为零，从45%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到33%非

[1]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农户籍人口比重之间，现存的12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可以挖掘出巨大的新增长源泉。何况即使今后城市化速度不会保持在3%、不会保持在2%，也不可能为零。

深度城市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是诸多挖掘另一半人口红利手段中的一个例子。在许多其他的领域，可资挖掘的潜力都是存在的，如消除劳动力流动和使用中的制度性障碍，以促进农民工就业；减小劳动者技能的供求不匹配，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促进城镇困难群体就业。此外，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机会，并通过两个手段并用，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接榫，防止经济增长源泉真空。^[1]

四、中国仍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观念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任何学术观点或政策建议，如果认为（即便是在未来）劳动力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以致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无论是针对笔者的批评意见，还是对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状况的一成不变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使得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2]以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基础十分地不牢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改革发生得太快，以致统计改革不能及时跟进。^[3]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农业劳动力为3.1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39.6%。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因素，农业普查的农业就业数字甚至更高。而事实上，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农业生产实际投入劳动的数量，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4]综合考虑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提高程度，可以认为农业实际容纳的

[1] 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请参见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 Young, Alwyn,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80 (March, 1994).

[3] 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1, No. 1, 1999, pp. 33~56.

[4] Cai Fang and Meiyang Wang,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6, No. 1, 2008, pp. 51~65.

劳动力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此，基于汇总统计数据得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1]或者由此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很低的结论，^[2]都会因为高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第二，关于劳动力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无法读懂，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相关结论。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的日趋多样化，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城镇就业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仅不再是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占主导的就业结构，而且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与此同时，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出从事非农就业，总量超过2.3亿，其中1.5亿进城务工。在常规统计中，城镇居民中的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的就业，除了通过汇总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约1亿人的总量和占城镇总就业约30%的比例外，通常没有可供进行分部门分析的数据。^[3]此外，迄今没有公开发布比登记失业率更反映现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数据，使得许多学者做出没有数据支撑的猜想。因此，许多研究者仅仅依据统计年鉴上的正规就业数据，以及任意性比较强的估计，来判断劳动力市场状况，得出就业零增长或者失业率仍然很高的结论，^[4]以致当全国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时，许多人无法接受其为真实的存在。

第三，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实际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常态。但是，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一致，^[5]始终没有定期发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并且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人口预测报告，一般读者更是不知道人口变动的趋势，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在2040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届时人口总

[1] Lau, Lawrence J.,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Next Thirty Years", presented at The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6 January, 2010.

[2] Minami Ryoshi and Xinxin Ma,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y: Compared with Japanese Experience", *Asian Economics*, Vol. 50, No. 12, 2009, pp. 2~20.

[3] Cai Fang, "The Consistency of China's Statistics on Employment: Stylized Fa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ies", *The Chinese Economy*, Vol. 37,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74~89.

[4] Rawski, Thomas G.,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4, 2001, pp. 298~302.

[5]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32，甚至低于1.51的政策生育率。许多人对此提出怀疑（于学军：“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人口研究》第26卷2002年第3期）。自此之后，关于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总体来说，政府部门趋向于认为仍然较高，学者相信的数字偏低。即便如此，争论的幅度也在1.6~1.8之间，远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

量为16亿。^[1]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的现实，以致不愿意相信人口红利的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五、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二元经济终结

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2]笔者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许多以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农业工资相等作为判别标准的研究，并不足以验证我们做出的判断。相反，只要观察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虽然刘易斯本人以及许多当代研究者，从纯理论的角度公开声称或隐含地表达，他们不在乎是否到达第一个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点到来与否，其实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涵义。如果承认转折点到来，就可以预见到并有助于理解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第二，新一代劳动者的更高需求，使得劳资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第三，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的涨薪潮，富士康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是普遍现象，也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从表1看，农业雇工、农民工和几个普通劳动力就业行业的工资上涨，在过去几年一直很快。这个工资上涨是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的，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的工资上涨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导致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丧失。至于那些仅仅依靠低工资、薄利润生存的血汗工厂，淘汰掉一批无关宏旨。此外，长期以来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则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工资上涨快一

[1] 刘遵义：“中国可从四个方面增加内需”，《中国新闻网》，2010年1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ylgd/news/2010/01-18/2077952.shtml>。

[2] Lewis, Arthur,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 in Di Marco, L.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pp. 75~96; Ranis, Gustav and Fei, John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1961, pp. 533~565.

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表1 2003-2008年工资年均增长率(%)

	农业雇工日工资		非农产业月工资
粮食	15.1	制造业	10.5
油料	11.3	建筑业	9.8
蔬菜	9.4	农民工	10.2
棉花	11.7		
规模养猪	21.4		

资料来源：粮食、油料、蔬菜、棉花和规模养猪的雇工日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数据计算得到；制造业和建筑业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其次，欧美国家和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另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劳动关系急剧变化。伴随着劳动力供求新形势，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提高、维权意识增强，遇到企业适应能力差、意愿不足的现实，必然会形成就事论事性质的局部劳资冲突。可见，中国目前出现的停工等劳资冲突，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是必然发生的，应该被看作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不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有经济学家建议我们不要用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办法，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来解决问题，以避免引火烧身。这是一种无视或压制劳资冲突的鸵鸟策略。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的挑战也是痛苦的。通常，当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劳资冲突被诱发出来或者说显性化。一方面，老百姓对收入改善的期望值提高；另一方面，有些在结构调整中成为脆弱人群。例如，在美国，每逢经济衰退就会出现制造业大量转移的情况，往往导致无就业复苏。而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后，许多原来的非熟练工人多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发达国家工会往往是制造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推动者。

更一般地说，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丝毫不亚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提升阶段。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在这个阶段上，决非一路凯歌前进，而是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欧美、日本、韩国等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许多国家长期停顿在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成长中烦恼。

简单地说，拉美的失败在于，常常采取承诺过多，引起民众更高预期的民粹主义政策。但是，既然不能也不敢损害既得利益，又难以实际兑现过高的承诺，收入分配反而恶化，只好又采取高压政策，结果常常导致社会动荡。这样的政策循环往复和疲于应付，使得无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在劳资摩擦加剧的时期，不无痛苦地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了解决劳资争议和对立的制度框架。虽然这种选择是有成本的，却是别无他途。只有用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规制和协调劳资关系，才不会把劳资对立转化为企业和职工对政府的不满。有人担心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下，谈判不成就会出现罢工。其实，没有集体谈判制度，罢工也不可避免，反而会把劳资矛盾转化为企业和职工与政府的对立。

六、承认人口新趋势导致对就业的忽视

无论是说劳动力供给仍然长期大于需求，还是断言劳动力会进入持续短缺的状态，其实都不是决定政府对待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定适宜的就业政策的必要条件。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是短缺的，历来是经济增长中的制约性要素，但是，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地位比中国要高许多。相反，只有正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不同就业人群的劳动参与新特点，才能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需求，有效地实施含义更广泛的积极就业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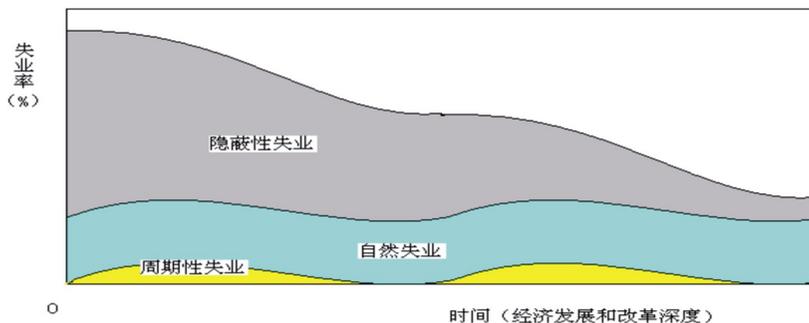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变的双重过程之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三种失业类型的并存及消长。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只面对着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周期性失业、受劳动力市场功能摩擦性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自然失业。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中国的劳动者也同样面对这两种类型的失业。此外，作为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中国还面临着隐蔽性失业问题的困扰，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企业冗员。较早的时候，人们对城乡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估计，分别都在30%~40%之间。^[1]

[1] Taylor, J. R., "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r, 1978-1989", in Kueh, Y. Y. and R. F. Ash (eds.) *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Post-Mao Reforms*, Chapter 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分别经过两个历程，中国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不断得到清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实现了异地非农就业，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显著减轻，而且剩下的劳动力中，一半以上超过了40岁。这次金融危机的经历显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对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愈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具有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其次，随着城市就业政策的调整与企业打破大锅饭的改革，劳动力市场加速发育，城市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实现了重新配置，一度的企业冗员大幅度被消化。

上述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也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群体，按照各自的特点以及面临的特殊就业困难，作出了大致的划分。我们可以借助图3来进一步观察这点，即原来的隐蔽性失业显著减少，不再显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性质。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则分别具有了不尽相同新特点。

图3 失业类型及其随改革深入的消长



首先，由于农民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但是又没有被劳动力市场制度良好地保护，因此，他们中的主要部分进入到易于受到周期性失业的行列，随宏观经济景气变化而交替表现为失业和短缺。积极的就业政策需要延伸到这个群体。同时，针对他们的制度需求，通过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冲破户籍制度设置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分割。

其次，经过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城镇就业人员，虽然通过重新配置实现了就业模式的转换，从冗员形式的隐蔽性失业状态，甚至可能经过了下岗和失业，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其中一部分特别是人力资本有脆弱性的40~50岁人员，常常陷入结构性、摩擦性自然失业的困扰。对于这个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就业政策应更加集中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则需要提高瞄准效果。

第三，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由于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其就业预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也存在匹配问题，因此，这个群体也将长期面对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难题。虽然正像城市企业冗员最终是经历了下岗、失业等痛苦的历程得以解决一样，因数量扩大和人力资本不匹配引起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将长期存在，但是，适度的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培训、中介等公共就业服务，可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虽然劳动力市场变化了的形势，丝毫也不意味着积极的就业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取向的确面临重大挑战。关于就业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各自面临的不同制度需求的解剖，不仅为理解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就业形势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也有助于正确划分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分工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即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着眼于应对周期性失业问题，劳动部门关注摩擦性失业问题，并与教育部门携手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为劳动者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护。▲

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

顾宝昌

【内容提要】“人口过快增长”这个几百年来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人口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中国的人口态势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在生育政策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人口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中国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城市化加速和人群广泛流动的社会。这些将不仅是中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低生育率 生育政策 小康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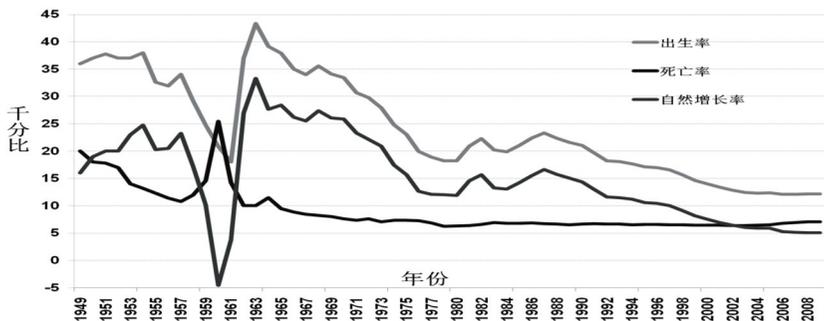
3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另一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这两件事在同一年发生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初，力图从经济和人口两方面同时着手向前推动的战略思路。3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的变化是空前巨大的、举世瞩目的。3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就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进行回顾并对它的前景展开热烈讨论的同时，我们不妨对人口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作一些归纳。30年来，中国的人口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所推行的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的人口形势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发生一些怎样的变化？这就是本文企图展开讨论的问题。

一、人口态势

当讨论到中国人口问题时，人们往往会想到中国人口多、规模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大多生活在农村，喜欢多生孩子，因此人口增长快，年轻人多。但突然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对中国人口的认识可能已经过时了，中国每个家庭平均生育的孩子已经不到两个，所谓的“大家庭”几乎不存在了；周围的婴儿少了而老年人越来越多，人口增长也越来越慢，农村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减少；而在不久的将来，印度人口就要超过中国，“世界人口第一”的桂冠也戴不了多久了。那么，中国的人口态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的态势。图1显示，中国每年的出生率在1970年代以前（如果不考虑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非正常变动）曾高达每千人出生近40个孩子，而现在已经降到十几个孩子的水平，那么还能说中国的出生率太高吗？中国每年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在1970年代以前，曾高达每千人增长20多个人的水平，而现在已经降到只增长5个人左右，那么还能说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快吗？

图1 中国人口变动态势（1949—2009）



不仅如此，从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继续不断放慢，人口的增长量在不断减少。表1是由国家统计局在每年的统计年鉴上公布的2000—2009年中国每年的人口变动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但出生率在不断下降，出生量也在不断减少，从2000年的近1800万，减少到2009年的1600万，在短短十年中，几乎减少了200万。但与此同时，死亡率有所上升，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跌，从2000年的0.8%又下降到2009年的0.5%，相应地，中

国人口的每年增长量在不断减少，从2000年的900多万，陆续下降到2009年的不到700万，在短短十年中，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

表1 全国人口变动（2000—2009）

年份	年末总人口 (万)	粗出生率 (‰)	出生数 (万)	粗死亡率 (‰)	死亡数 (万)	人口自增率 (%)	人口增长量 (万)
2000	126743	14.03	1771	6.45	814	0.758	957
2001	127627	13.38	1702	6.43	818	0.695	884
2002	128453	12.86	1647	6.41	821	0.645	826
2003	129227	12.41	1599	6.40	825	0.601	774
2004	129988	12.29	1593	6.42	832	0.587	761
2005	130756	12.40	1618	6.51	849	0.589	769
2006	131448	12.09	1585	6.81	893	0.528	692
2007	132129	12.10	1595	6.93	913	0.517	681
2008	132802	12.14	1608	7.06	935	0.508	673
2009	133474	12.13	1615	7.08	943	0.505	672

人口变动主要取决于出生、死亡、迁移（迁出和迁入）三个因素。如果不考虑死亡和迁移，那么人口变动就由生育状况决定了。因此，在观察人口态势时，往往十分关注生育态势的走向。考察人口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以所观察的某年（某时期）的15~49岁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的总和而得，并假定15岁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将与所观察的分年龄生育模式相同。在运用总和生育率考察生育态势时，人口学家特别看重“更替水平”的概念，即一个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所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一对夫妇要实现下一代对自身的更替，就需要生育2个孩子，但由于下一代在出生后还要经过几十年（比如20年），才能达到能生育的年龄，期间会出现死亡的可能，因而要加上死亡的概率（比如0.1个孩子），这样，一般把一对夫妇需要生育2.1个孩子作为实现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2.1。简言之，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上，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多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下，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少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小，出现人口萎缩。因此，人口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是保持在更替水平（2.1）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

图2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1950-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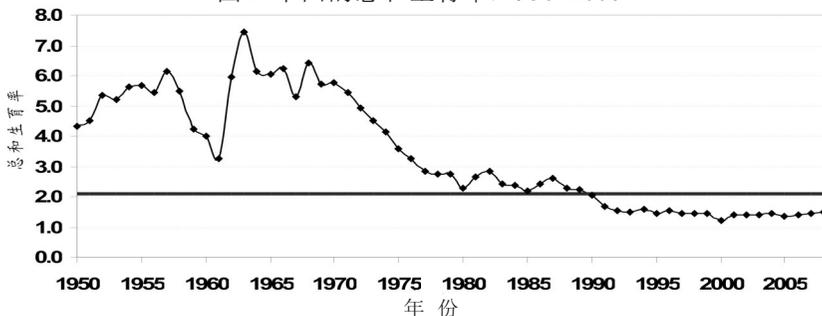


图2是中国从1950-2008年的总和生育率的走势图。从图上可以看出，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个家庭平均生育5~6个孩子，这从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们几乎家家都有多个兄弟姐妹就看出来了。到1970年代出现了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1971年的5.43下降到1980年的2.26，在短短十年中下降了一半，成为人类生育下降史上的奇迹。而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又进一步跌至更替水平(2.1)以下，迄今已经达20年之久。

表2 全国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 (2001-2008)

分年龄生育率(‰)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5-19	2.70	2.68	5.25	5.56	6.34	4.59	3.83	5.26
20-24	107.70	113.15	122.67	120.85	114.46	101.52	93.67	94.60
25-29	115.37	106.09	102.44	107.60	91.70	99.70	103.78	101.44
30-34	40.06	42.68	38.28	42.21	40.22	47.00	52.34	53.85
35-39	9.22	9.68	8.65	10.14	10.98	16.23	20.41	21.93
40-44	1.83	1.88	1.77	1.93	2.05	4.42	6.70	9.93
45-49	0.60	0.37	0.56	0.41	0.77	2.26	5.19	6.65
总和生育率	1.39	1.38	1.40	1.44	1.33	1.38	1.43	1.47

表2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在每年的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分年龄生育率，稍加计算就可以得出每年的总和生育率。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1-2008年，尽管中国妇女的生育形态有所变化，如，20~24岁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下降而25~39岁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上升，反映了妇女生育时间上的推延；但总的来说，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左右的水平，即远远低于更替水

平，换句话说，已经到了每个家庭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的水平，难道还能说中国的生育水平过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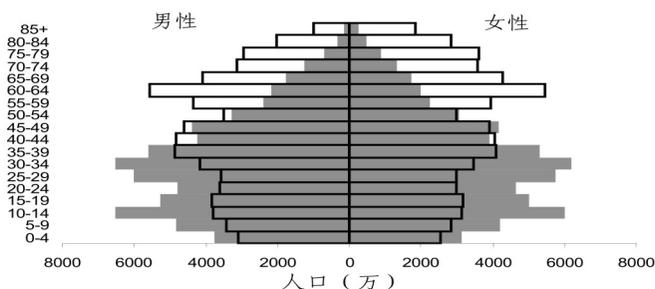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可以和世界上的若干国家和地区作一个比较。表3是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10年《世界人口数据表》公布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情况。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5，即意味着，按照这样的生育水平，每个家庭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和俄罗斯目前的水平相当，低于美国和欧盟的水平，略高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远低于印度。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则已经跌到了1.0的极低生育水平。

表3 世界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国家和地区	总和生育率	国家和地区	总和生育率
世界	2.5	中国大陆	1.5
发达国家	1.7	中国台湾	1.0
美国	2.0	中国香港	1.0
欧盟	1.6	韩国	1.2
俄国	1.5	新加坡	1.2
日本	1.4	印度	2.6

长期处于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和这样低的生育水平会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只要看看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就清楚了。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的中国人口金字塔（图3中的阴影部分）显示，中国人口除10~14岁的年龄组以外，在34岁以下的人口在不断地萎缩，而在10岁以下（即1990年代出生的人群）更是不断减少。这种趋势发展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结构会从金字塔状变为柱子状，即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而年轻人口不断减少。

图3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2000年（阴影）和2050年比较



归纳来说，在近几年来由于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保持在高水平而形成的“人口过快增长”这个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人口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我们也可以从关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讨论，从关于小学不断萎缩、小学生不断减少的众多报告中看出端倪。作为它的一个标志，中国将在今后几十年里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转让给邻邦——印度，看来是无疑的了。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人口态势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二、生育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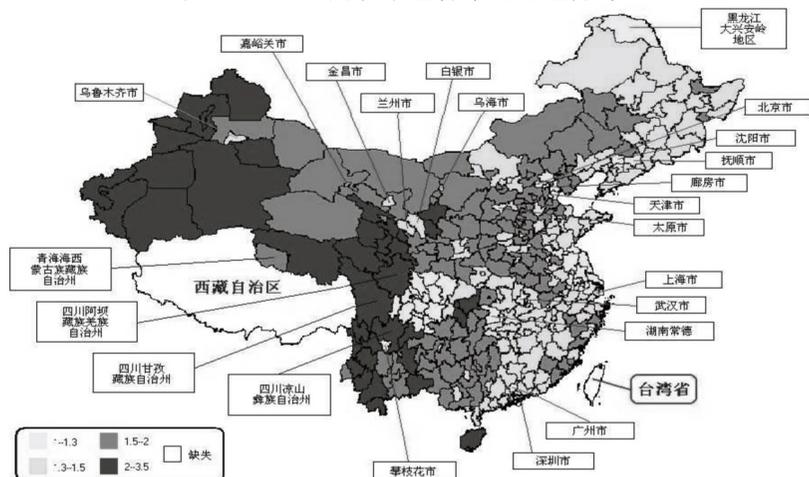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人口态势特别是生育态势的变化，我们必须对中国实行的生育政策进行考察。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生育政策曾发生过一些变动，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生育政策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但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为4种情况：1) 在城市地区和江苏、四川、重庆的农村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一孩政策”；2) 在其他多数农村地区实行第一个是女孩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一孩半政策”；3) 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二孩政策”；4) 在个别地区如对西藏的藏族农牧民没有规定孩子数量的限制。但是，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人口（如城乡人口）中可能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而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家庭必然有一部分（第一个是男孩）只能生一个，而另一部分（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两个，那么如果一个地区的夫妇完全按照政策的规定生育，该地区将达到怎样的生育水平？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全国各地区的生育政策所指向的生育水平，即“政策生育率”，进行了量化分析。^[1]

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大多数的地区的政策生育率在1.3~1.5之间，而且，从东部到西部，政策生育率呈现由低到高的倾向，基本上与中国东中西三个经济带的发展水平相对应。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53%），这主要是由中部地区（70%）的情况所决定的，而这显然是与中国以农村为主体的人口状况相对应的。按照现行的生育政策的生育结果，全国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占63.1%，两个孩子的家庭占35.6%，三个孩子的家庭占1.3%。也就是说，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最终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

[1]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庭”的比例大致可以归纳为一种“六四开”的情况。从全国总体来看，政策生育率的平均值在1.465，也就是每个家庭平均不到一个半孩子。这样的生育政策必然对中国的生育态势产生强烈的导向作用，使生育率趋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影响到中国的人口态势的走向。

图4 全国不同政策生育率的地区分布



这些年来，人们对生育政策的关注越来越强烈。人们为什么对生育政策问题那么关注呢？当然是因为它实在事关千家万户。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是否生孩子、什么时候生、生几个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们的行为趋向于多样化，人们的权益趋向于个体化。在生不生、生几个的问题上，夫妇能否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在各方面对个人生活的直接干预已经越来越淡化，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还要固守计划经济时的旧规呢？一个通常的反对意见就是，中国人口众多，并且不断增大，如果再让多生孩子，问题就会更严重。这就可以看出，在生育政策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人口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

为了呼吁对生育政策问题的重视，一批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在世纪之交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着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对中国实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量化研究和人口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在2004年4月起草并递交了由18位学者共同署名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提出，为了促进中国人口与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继续提倡晚婚和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从现在开始，由现行的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是完全必要

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课题组提出了“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的渐进式的调整方案。《建议》呼吁尽快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制定方案，并选择少数地区先行试点探索经验。^[1]

2004年调整生育政策建议的提出，引起了对生育政策问题的广泛关注，但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这些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人认为，生育水平取决于生育政策，生育政策越松生育水平就可能越高。目前中国的比较低的生育水平主要是由于比较严的生育政策所致。如果生育政策放宽，就势必造成生育水平反弹；但也有人认为，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有重要的关系，但并不是生育政策越宽松生育水平就越高的关系，适度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反弹。二是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的认为，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与严格的生育政策没有关系，主要是由于重男轻女造成的。即便是生育政策放宽，也解决不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催化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可以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三是计划生育工作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人认为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得以开展就是靠比较严的生育政策，如果生育政策放宽了，计划生育工作就没法干了；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不好干，就是因为生育政策不尽合理，在实行了多年严格的生育政策，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调整，计划生育工作将难以更好地开展。

为了回答这些质疑，特别是如何认识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系，我们对若干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地区，包括甘肃省的酒泉、山西省的翼城、河北省的承德、湖北省的恩施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表4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二孩政策”的甘肃酒泉地区和所在的实行“一孩半政策”的甘肃全省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酒泉实行的是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但它的各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指标都好于全省。而表5反映了实行“二孩政策”的山西翼城县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比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它所在的临汾市和山西省要低，也比全国的水平低。表6则进一步反映了2000年以来翼城的出生人口中一孩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而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三孩则几乎没有；同时，出生性别比基本上保持正常。

[1] 顾宝昌、李建新：《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5～219。

表4 1999年酒泉地区与甘肃全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数据比较

项目	全省	酒泉地区
人口出生率	15.61‰	14‰
人口增长率	9.17‰	7.2‰
计划生育率	85.6‰	99.99‰
妇女总和生育率	1.9	1.54
一孩妇女比例	29.18%	44.4%
两孩妇女比例	41.12%	41.82%
多孩妇女比例	24.05%	8.19%
妇女综合节育率	88.60%	88.2%
晚婚率	51.28%	64.41%
多孩率	1.5%	0.08%
早婚比	0.36	0.02
计划生育合格村	58.2%	95%

来源：王素银：“在中国人口学会调研酒泉地区人口生育政策座谈会上的发言”，《西北人口》增刊，2000年。

表5 翼城县与全国、全省和全市的指标比较

年份	人口出生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翼城县	临汾市	山西省	全国	翼城县	临汾市	山西省	全国
1981	19.27	18.79	21.1	20.91	12.09	15.85	14.4	14.55
1989	20.12	22.96	20.2	20.98	12.82	17.82	13.9	14.7
2001	9.11	13.51	13.06	13.38	3.79	7.71	7.16	6.95
2006	8.76	12.42	11.48	12.09	3.80	6.42	5.75	5.28

表6 翼城县人口及出生人口状况

年份	总人口	出生数	出生孩次分布(%)			出生性别比
			一孩	二孩	三孩	
2000	300230	2810	59.9	40.0	0.1	105.0
2001	301792	2397	65.8	34.1	0.1	104.3
2002	304143	2500	66.4	33.6	-	115.1
2003	306537	2503	68.8	31.2	-	106.2
2004	307992	2535	74.4	25.6	-	105.9
2005	310612	2421	73.6	26.4	-	107.5
2006	313689	2735	73.3	26.3	0.4	112.3

甘肃省的酒泉、山西省的翼城、河北省的承德、湖北省的恩施这些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迄今已经有20多年了，覆盖的人口达八百多万。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环境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从来没有达到2（即并没有达到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而一直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多孩生育增多的情况。“允许生育二孩人们就会生育三孩”的推断并不符合事实。这些地区的政策尽管允许生育二孩，但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生了一孩想再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了”，三孩生育“微乎其微”。说明即使在普遍可以生育二孩的较宽松政策下，人们也并非一定都要生二孩。而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二孩政策更易于群众所接受，缓和了干群矛盾，减少了工作难度，推动了计生工作向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优质服务转移。

这些地区20多年的实践表明，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达到了“既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又被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目标。它们的实践可以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对宽松的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如果这些在20年前起步的试点地区能在实践中取得如此可喜的效果，那么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远远向前发展的21世纪，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二孩生育政策完全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1]

关于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关系的另一个案例就是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五峰县）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长阳县）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南部的武陵山地，都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湖北省人大批准，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许普遍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至2007年9月底，长阳县出生率为7.30%，自然增长率为1.27%，总和生育率为0.88（即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至2007年，五峰县出生率为6.95%，自然增长率为1.39%，总和生育率为0.9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长阳、五峰两县调整生育政策几年来，生育水平持续平稳，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出生性别比也保持正常。两县的实践表明，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只要继续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的稳定。^[2]

[1] 顾宝昌、王丰：《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 杨菊华：“梅开二度：湖北省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新二孩生育政策调研报告”，见《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98～332页。

为了进一步根据今天的现实回答当生育政策调整为“可以生育二孩”后可能对人口形势的影响，我们与江苏人口计生委合作组成“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在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两个县开展调研。与全国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省实行全省包括农村在内的“一对夫妇只生一孩”的政策，同时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即单独二孩政策）。经过20多年，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当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现行政策关于生育二孩的条件时，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又会怎样影响当地的生育形势和计划生育工作？这些成为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对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也为探索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当地生育形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所。

2006年末在六个县18638名育龄妇女中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所调查的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4284名育龄妇女中，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在这些符合生育二孩的妇女中只有45.1%表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而在这些认为生育两个孩子最理想并已经有一孩的妇女中，却只有21%明确表示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打算。调查对象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孩子，说明少生孩子已经蔚然成风。调查也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不断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生育的功利性正在减弱，而精神需求方面的考虑正在增强。^[1]

在这些年新的调研和新的认识的基础上，2009年1月又形成了由27名学者共同署名递交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再次提出，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应尽快加强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消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绝对化、极端化的思维倾向；为了取得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经验，应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并允许各地积极稳妥着手试点探索经验。^[2]

为了加强与经济学界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起于2005年12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这是首次中国的经济

[1] “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课题组：“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 顾宝昌、李建新：《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20～229。

学家和人口学家齐聚一堂就中国的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问题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就经济发展战略和人口的关系、人口老化、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医疗与养老保障、储蓄率和人口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1]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出版的2006年度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也以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为主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为了进一步加强与经济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于200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次举办了“低生育率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就中国低生育水平现状及其形成机制、宏观和微观人口经济背景、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特别是现行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低生育率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3]

这些年来对于生育政策问题上的反复争论表明，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处于人口压力下形成的思想定势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由于各种争论，无论在思想准备和实践探索方面已经耽误了整整十年。由于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缺乏认识，各种意见也远未统一，即使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也难免给人以“仓促上阵”的感觉，这就为能否成功地实施带来艰难的挑战。

三、未来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人口的未来走向的讨论要比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的讨论相对容易得多。对于经济的未来走向往往会面临不少不确定的因素，比如2008年的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展望中国人口的未来，有两个观点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论。一个是“出生高峰论”，一个是“劳动力充裕论”。

“出生高峰论”认为，中国在2000年以后还会出现每年新增人口高达上千万的局面，并在今后几年面临一个新的出生高峰（也有的称为第四次生育高峰）。我们在前面的表1中已经看到，在2000年以来的10年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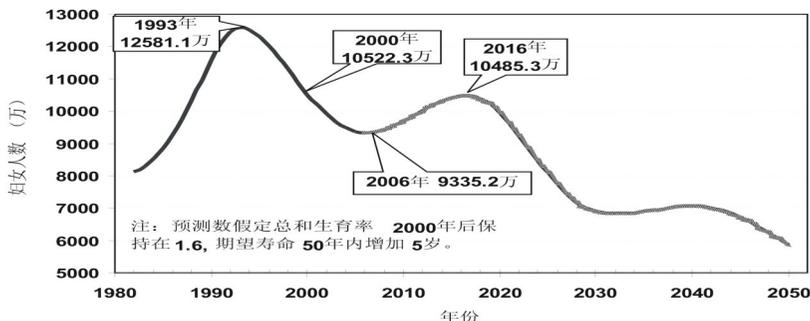
[1] 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蔡昉、顾宝昌：《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6）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7 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 曾毅、顾宝昌、郭志刚：《低生育率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年增千万”的情况；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口的年增长量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减少，从2001年的960万下降到2009年的670万。

图5 中国20~29岁育龄妇女数量变化和预测（1982-2050）



而所谓“面临出生高峰、人口形势严峻”是指在今后几年中会出现育龄妇女增多的局面，因而带来出生人数的上升。我们在图5中显示了1982-2050年中国20-29岁育龄妇女的数量变化和预测情况。可以看到，在此期间，中国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最高峰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1.25亿（1993年），2000年降为1.05亿，2006年又降为0.9亿。2016年将会上升到1.04亿。但这一人群尽管大于目前的人群，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更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图6 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变化和预测（1982-2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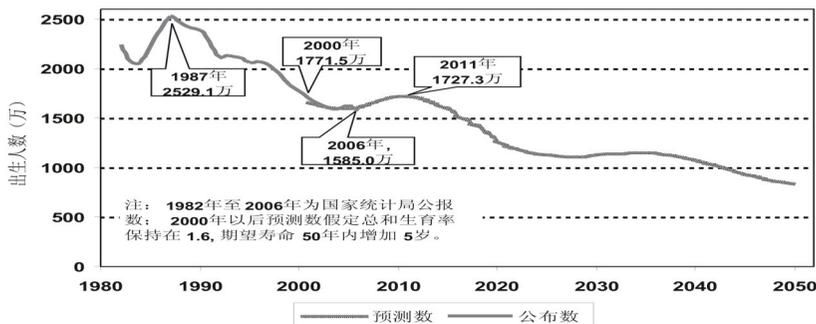


图6显示了1982-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化和预测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生人数最高峰在1987年，曾达2500多万，2000年降为不到1800万，2006年又降为1500多万。2011年会上升到约1700多万，但这一出生量尽管大于目前的出生量，仍不到2000年的水平，更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人们往往不注意的是，图5和图6显示，今后几十年中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和出生人数都将出

现急剧减少的趋势，到21世纪中叶，20~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预计会下降到5000万，出生人数会下降到850万，即在短短几十年中减少一半。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对于未来几年中可能发生的所谓人口反弹和出生高峰问题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给予客观和恰当的评估。

“劳动力充裕论”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65岁的人群在今后几十年中将继续十分庞大，达到8亿~9亿，“是美国人口的数倍”，所以根本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而不承认“民工荒”的存在。应该指出，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未来适龄劳动力出现急剧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将从2030年的9.3亿下降到2040年的8.3亿，即每年减少1000万，十年中减少一个亿。更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所反映的“民工荒”主要指的是“年轻劳动力荒”，即30岁以下的劳动力的短缺。

图7 中国20~24岁新增劳动力数量变化和预测（2000-2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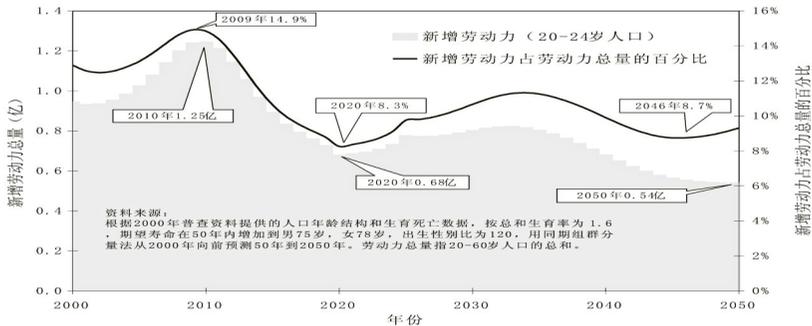


图7显示的是2000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20~24岁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和预测情况，反映了中国20~24岁的新增青年劳动力将出现持久性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6800万，其占20~60岁的总劳动力的比例也从14.9%下降到8.3%。它表明，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将在今后的十年中骤减一半以上，也表明了中国的整体劳动力将出现急剧老化。这些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富活力、最有创造力的青壮年人群的急剧萎缩势必损伤中国创新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用劳动力总量的庞大来证明“劳动力的充裕”而否认中国“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劳动力不断老化”的长远趋势显然并不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劳动力供应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要素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随着低生育率的到来，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人口形势，表现出下面四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是生育率将继续走低。在经历了自20世纪90年代之初以来近二十年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以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建起的希望小

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而闹“民工荒”。而低生育率效应的最近的信号就是近几年越来越严重的高考人数的锐减，宣告了多年的“高考热”将风光不再、“寿终正寝”。由于按规定报考大学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因而排除了非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效应。报考大学人数的减少当然与教育全球化、升学多元化等趋势有关，但根本上是由于适龄人群的减少。教育部门开始忧虑高校招生不足，效应难以维持。18年前出生的孩子少，18年以后报考大学的适龄青年就少，这些现象的到来本来是并不难预见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为人口增长的表象所主宰而不愿意承认而已。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可能再回升到高水平吗？欧洲和亚洲许多为低生育率而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提示我们，生育率一旦跌入低于更替水平的“陷阱”就难以回升。再看看我们面对的80后、90后、00后，能够想象今后的家庭会普遍生育两个以上孩子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在今后将继续走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低人口增长率的时期，但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的时期。一个生育率低下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二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长期处于低生育率，加上中国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必然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们健康水平提高、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是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一种过于淡化的看法。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在于，一是速度快，以致从社会到家庭都难以如发达国家那样在漫长的过渡中逐渐适应而感到措手不及；二是数量大，老年人口的猛增必然对社会对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三是所谓的“未富先老”，即其他发达国家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而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中国是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就面临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是超前于国家的现代化而到来的”。^[1]中国必须在经济还不发达、时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对急剧的人口老龄化作出应对，无论对经济、对社会、对政府、对家庭来说都不能不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广大农村历来是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世代代依靠的是“养儿防老”，但随着生育率下降，家庭子女不仅变少了，而且随着人口流动，纷纷离开农村流向城市，因而农村面临比城市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当然，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远远不仅是一个老年人口增多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将变老而缺乏活力的问题。表示整个人口变老的最好的指标就是人口中位年龄。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在今后几十年中从2000年的30岁上升到2050年的45岁，即在短短的50年中上升15岁，届时中国一半的人口在45岁以上。

[1] 顾宝昌、彭希哲：“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人口学刊》，1993年第1期。

这样一个急剧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过，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已经表现出广泛的关注，但应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三是城市化不断加速。中国曾经企图在没有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事实证明，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不是高度城市化的，也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高度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向上提升，目前已到47%。也就是说，很快，中国将成为一个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的国家。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但突然农村人口将成为少数。费老所描述的传统“乡土中国”^[2]将从此不复存在。尽管有人认为目前的城市化有“虚假性”、“人为性”，但并不能否认城市化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都市社会”的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下子要变成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不能不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尽管我们的认识还刚刚开始，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口城乡分布的转折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能也将是革命性的。如果把这种变化仅仅看成是一个人口分布的变动，那可能是太狭隘了。可以相信，它必然会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区域结构、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必将是史无前例的。

四是流动性不断增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从过去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到现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城市到城市的流动、农村到农村的流动，人口流动已经呈现出一种“全面开花”的态势。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也有的统计已经到达两亿以上。不同的口径反映的流动人口数量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中国人口流动的汹涌澎湃。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会证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与千百年来“小农社会”彻底告别的根本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而且也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之强烈，对中国社会变

[1] 顾宝昌：“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载蔡昉、顾宝昌：《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6）——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7 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革的影响之深远，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既是人口转变的势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仍然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情况，甚至面对着流动人口的汹涌到来而不知所措。流动人口因而被称为“盲流”，但“盲流不盲”，人口的流动有着强烈的方向性和规律性。事态的发展将使人们不能不认识到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实在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现象，并成为主导中国的人口态势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离开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作出中肯的分析。

总的来说，我们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城市化加速和人群广泛流动的社会。这些将不仅是中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我们缺乏经验、缺乏准备、缺乏认识。但无论如何，这些特点将必然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要素。当我们进入建立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时，我们难道可以对这样深刻的人口变化以致社会变化熟视无睹吗？我们看到，尽管对于小康社会的讨论非常热烈，包括小康社会的定义、内涵、指标、评估等等，但其中对于中国人口的如此深刻的变化却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这就使关于小康社会的讨论难免给人以概念化的倾向。

因此，我们面临的人口挑战远远不仅是一个生育政策问题，而是迎接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的到来。而如果我们在生育政策的调整上都不能迈进一步，那我们在应对全新的人口挑战面前必将步履艰难。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行动，都将决定几十年后的未来，而今天的80后、90后、00后就将是其后果的直接承担者。

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建设有着自身的规律时，难道可以认为人口问题是可以随意摆布的吗？当人们对经济走向热议不断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育政策难道不可以见仁见智吗？当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过热过冷都会坏事时，难道可以认为生育率的下降是越快越好、越低越好吗？当人们对人口统计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争论不休时，难道可以对中国人口的大趋势视而不见吗？所有这些都表明，现在是到了对于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所持的视角和倾向展开一次清理的时候了。▲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郭志刚

【内容提要】近20年来,政府发布的生育率口径与实际人口调查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情况是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以来有关认识严重脱离实际的反映。实际上,出生和生育统计已经长期陷入一种轻视调查结果、过于依赖主观判断的统计怪圈。这种状况的延续不仅会导致对当前总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的统计极可能也存在严重偏差,而且还引向对人口老龄化风险性的忽略,误导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和决策。

关键词: 低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 未来人口趋势

一、中国的低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

总和生育率(TFR)是反映时期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反映出如果一批育龄妇女按照当下的年龄生育率来进行生育的话,将生育多少个孩子。这个指标既可以用于不同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可以用于对同一人口在不同年份进行对比。更重要的是,总和生育率还能够反映出当前这种生育水平对人口长期发展的影响。比如,经常提到的更替水平就是指能够保持未来人口不增不减的生育率。当不考虑死亡影响时,即如果所有子女都能生存到父母在生育他们的年龄时,那么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即能保持人口均衡更替。但是,考虑到会有少量子女在此之前夭折,所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8ARK001)的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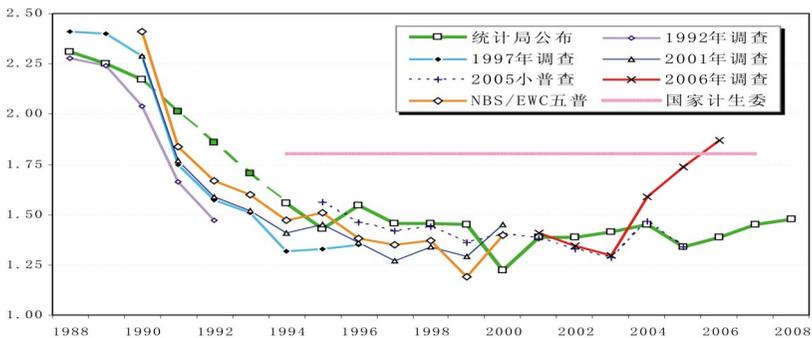
常用2.1的总和生育率来作为更替水平的参照标准。

中国的生育转变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生育率中断了下降趋势，呈现出在2.5左右起伏徘徊。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初并直到现在，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

在前两个阶段中，生育率都处于更替水平以上，对人口及生育方面统计数据也并无疑义。然而，伴随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生育率就成了一个谜。尽管中国人口学界对低生育水平这种笼统表达没有异议，但是却丧失了对具体生育率的准确把握。由于近20年来已经搞不清楚每年的确切出生数，又因为出生数是生育率的分子，因而生育率也就搞不清楚了。其主要表现是，政府部门在宣传和人口规划中使用的1.8生育率口径远远高于历次实际人口调查的结果（图1）。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次全国人口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前期的下降实际上是在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平均生育水平1.47接近，并且后来大体稳定在这个水平上。^[2]仅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的生育率不仅已经“很低”，而且几乎可以算是“极低”了。与此不同，政府部门则一直坚持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口径。两者之间存在着0.3以上的差距，虽然名义上都可以统称为低生育水平，但是0.3以上的差距在低生育率测量中可以视为巨大的鸿沟。

图1 各种来源的全国总和生育率统计或估计



资料来源及说明：该图引自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1) 统计局公布：见各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2009年。其中1991—1993年未提供生育率统计，以1990年和1994年生育率线性内插值代替，用虚线表示。

[1]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2]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2) 国家计生委：见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8)》，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年。

(3) 1992年调查：于景元、袁建华根据1992年中国生育率调查数据计算（于景元、袁建华：“近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状况分析”，载蒋正华主编：《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4) 1997年调查：郭志刚根据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郭志刚：“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5) 2001年调查：丁峻峰根据2001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丁峻峰：“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人口研究》，2003年第2期）。

(6) NBS/EWC五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东西方中心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东西方中心编：《中国各省生育率估计：1975-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7) 2005小普查：郭志刚根据2005年全国小普查2‰数据样本估计并调整（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8) 2006年调查：引自《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集》（张维庆：《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年）。其中2006年总和生育率引用自该调查的主要数据公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中国人口网：http://www.chinapop.gov.cn/zwgk/gbgb/t20070321_152715281.html）。

图1中只有一条来自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的生育率曲线与其他人口调查结果极为不同，它反映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2004年开始飙升，凌驾于其他调查的生育率之上，并且在2006年甚至超过了1.8水平。这次调查结果曾经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导致一段时期中“生育率反弹”、“形势严峻”的舆论骤起，影响极大。然而根据研究，这一调查的生育率飙升其实是由于该调查的偏差所致。^[1]该调查遗漏了大量年轻（即30岁以下）的妇女，而且其中很大比例是未婚者，遗漏了她们便会显著缩小生育率的分母，导致生育率的偏高。如果没有这种抽样偏差，那么其生育率结果与其他调查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并且，从同期及后来国家统计局更大规模的年度人口变动调查结果来看，生育率依然处于很低水平。

其实，十几年来政府部门所坚持的1.8生育率口径只有2006年调查结果这一个孤证，甚至就是这次调查也反映出2001-2003年生育率很低，与其他实际调查一样，并不能支持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口径。这一口径的支撑主要依赖于各式各样的间接估计证明，然而，这类间接估计证明虽然层出不穷，却往往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方法或数据方面的缺陷。因此可以说，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以后人口统计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即“见到低生育率调查结果→归因于出生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结果→再调……”。这一怪圈首先起始于认为调查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完全不可信，然后借助各种应运而生的出生漏报估计和生育率估计将生育率提高到主观能接受的水平。因此，人口统计长期陷入迷茫状态，

[1] 郭志刚：“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2期；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政府部门坚持的口径与实际调查结果之间严重脱节，但是习惯成自然，已经熟视无睹。十几年来，很少有人反过来想一想，调查取得的很低生育率是否可能真的反映了事实，或者至少可以大致反映事实。陷入这个怪圈，对调查统计结果就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而人口统计上则成了按经验和习惯思维所做的主观判断，破坏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正常联系，认识越来越脱离实际，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以往的出生漏报率被严重高估了

在1990年代初，人口调查统计结果反映出生育率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整个人口学界对这样的结果充满了怀疑和质询。尽管当时人口变动调查的事后质量抽查表明出生漏报并不是很严重（1993年和1994年都不到7%），但舆论压力太强大了，导致国家统计局甚至将抽样随机误差都作为出生漏报偏差来加以调整。^[1]这样做显然是违背统计科学规律，导致对外公报的出生数和出生率被夸大。根据笔者匡算，那时全国出生数的调整量每年约300万，其中一半以上其实并无实据。也就是说，每年大约会虚加150万出生。并且，这样的“调整”还会积累起来，使得少儿人口数量偏高，总人口数也偏高，并且年复一年地使偏高幅度越来越大。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初步展示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次普查实际登记了12.43亿人口，公布的登记总漏报率为1.81%，普查公报的全国人口数为12.66亿。两者之间相差了2300万人，除了其中的250万军队人口，其余相差的2000万人还大于上述匡算的10年累积调大的1500万人。

事实上，这次普查中还发生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关于这次普查的国务院令中已经事先规定了10天现场登记的期限，但是在登记过程中又突然决定再延长10天。也就是说，上述普查登记的12.43亿人中的一部分是在延长的10天里被追加进去的。外界既不了解为什么要延长登记时间，也不了解在延长的登记时间中到底追加了多少登记人口。但可想而知，原定10天的登记时间都是事先按普查员人数及承担登记工作量计算好的，因此追加登记时间的原因不大可能是因为该完成的登记工作尚未完成，更可能的原因是登记人数距事先预计水平差距过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追加更多登记时间其实作用也不会太大，更方便的应付手段是重复登记常住人口以及将那些已长期外出的本地户籍人口充作常住人口加以登记。

此外，这次普查之后国务院普查办公室要求各省分摊那2000多万“漏报人口”

[1] 贾同金、赛音：“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现状与问题分析”，《人口研究》，1995年第5期。

时也出现了不少纠纷。从各省编辑出版的五普数据文献中，可以看出很多省对于所摊派的漏报并不太认账。过去10年里，人口学界关心的主要还是出生漏报，也有一些学者发现这次普查其实也存在明显的重报。所以，五普时中国的总人口到底是多少，其实至今仍难以确定。

简而言之，这次人口普查并没有查出以往预计的出生漏报，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前10年产生的一系列人口统计疑问也没有得到解决。本来人口普查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核准人口总量与结构，达到重新洗牌的目的。然而，这次普查之后却出现了大批根据以往统计公报的出生数来判断这次普查的低龄人口漏报情况的研究，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有本末倒置之嫌。

这次普查只是公布了一个笼统的1.81%漏报率，并没有提供漏报人口的性别和年龄信息。如果更细致地用该次普查公报的三大段年龄组人口数与相应登记人口数（再加入250万军队人口）做一比较，便可以发现0-14岁和15-64岁人口数基本都是按上述1.8%的漏报率调整的；而65岁及以上老年段则根本不存在漏报，人口数反而被调整得更少了。所以，这次普查能够提供的漏报情况其实并不是像以往猜想的那样仅仅是漏报了低龄少儿人口，而且漏报也同样表现在青壮年人口上，很可能是与大量存在的流动人口密切联系的。青壮年人口漏报的特点实际上在以后各年人口变动调查中都普遍存在，而且问题是越来越显著。

2000年人口普查中追加登记时间等现象很可能主要出自于预计总人口与登记总人口相差太多所导致的，所以已经反映出以往认识与实际脱节的问题。事实上，统计部门也对此有所认识，从以往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公布的出生率和少儿比例及相应人数来看，2000年普查以后和2005年小普查后都做明显下调，这反映出以往公布的出生数被调整过度了。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以往这种对出生率或生育率高估或过度调整的情况十分可能一直在延续着，然而却没有在生育形势和人口预测研究领域得到应有的重视。

多年来一谈起人口漏报，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出生漏报，因为层出不穷的间接估计研究认为出生漏报率约在30%左右，而只有30%左右的出生漏报率才能将调查得到的极低生育率调整到1.8左右的水平。实际上，笔者曾撰文评论过其中一些估计存在的方法和数据方面的缺陷，有一些甚至完全是错误的。^[1]但是，这些并不可靠的间接估计仍然还是宣传和决策的依据。

[1] 郭志刚：“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论文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8月；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最近，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公布了《省级人口个案库数据质量评测结果》。^[1]这是人口计生委系统首次采用追踪方法收集个案信息，对其中的流动人口开展双向协查，并开展人口基础信息核查。此次上报个案数据的20个省，覆盖人口共计9.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9%。20个省2000-2009年的出生人口汇总数，与人口计生统计报表数据相比高出12%。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差距呢？长期以来，中国人口统计主要有三大数据来源，分别由国家统计局、公安部、人口计生委负责，不同来源统计结果一直存在差异。在出生人数统计上，计生报表的数据质量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以1989年为例，计生报表统计出生1671万，户口登记出生1807万，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2293万，而“四普”登记2462万。^[2]也就是说，要以四普出生统计为准，人口变动调查的出生漏报率为6.9%，户口登记出生的漏报率为26.6%，而计生报表出生的漏报率则更高，达32.1%。所以，我们应该明确计生报表的漏报率历来就十分严重，但是它并不代表其他人口调查统计的出生漏报都同样严重。在2000年以后，人口计生统计报表误差仍较严重，据说2007年的出生漏报率达30%。但是，这次公布的以省级人口个案数据库为标准的评估结果中，2000-2009年人口计生统计报表的平均漏报率居然仅有12%，远远低于以往一直风传的30%的出生漏报率。这到底是表示该数据库人口信息也类似地存在出生漏报问题呢，还是表示计生报表的出生漏报率在2000年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严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计生报表出生统计而言，这个12%的出生漏报率与历史记录相比其实不仅不高，而且可以认为很低。此外，要是计生报表的出生统计漏报率仅为12%的话，其他来源的出生统计漏报率岂不是会更低吗？那么，这实际上揭示出，以往很多出生漏报估计得出的30%漏报率的结论远远脱离实际，在此基础上得出的1.8生育率估计会显著偏高，因而具有误导性。

尽管在人口研究中，经典理论、以往经验、传统方法、间接估计都可以借鉴和采用，然而通过直接收集的数据来反映实际情况并不断检验主观认识是否正确，是宏观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可以先入为主地认为很低生育率的调查统计结果“难以理解”、“难以置信”、“根本不可能”，并自行其是地将调查统计结果调整到自己认为“正确”的水平。认识正确不正确，必须要经实际数据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关于省级人口个案库数据质量评测结果的通报”，2010年第59号，中国人口网：http://www.chinapop.gov.cn/tzgg/201007/t20100715_209860.html。

[2] 张广宇、原新：“对1990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人口研究》，2004年第3期。

在低生育率新时期中，很多传统理论、观点、经验正在过时，再继续以它们为准来做判断很容易产生错误。低生育率之所以还是个谜，主要是因为对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研究不够。笔者近年来对中国的低生育率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其他低生育率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也同样存在，^[1]因此不能因为以往调查中的确存在出生漏报而简单地把这些调查结果视为“虚假统计”。

2010年要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希望这次人口普查能够按照所定计划和安排展开，所提供的最新全面人口数据能够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检验和增进我们对人口形势的认识。

三、生育率迷茫与当前人口老龄化的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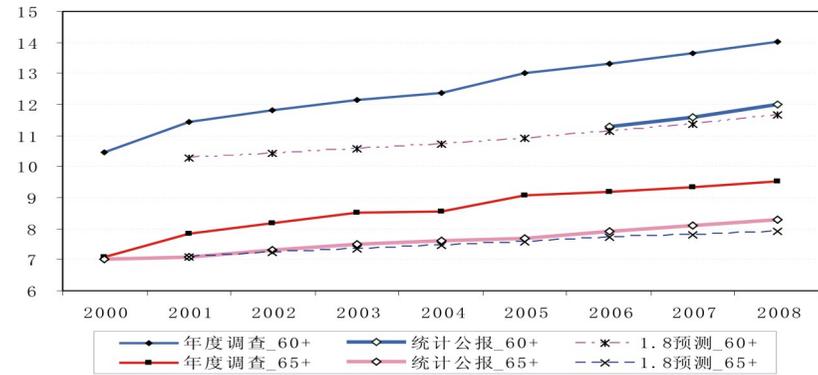
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只设立了人口数量峰值上限，但是却没有设立过人口老龄化峰值上限。因而人口数量控制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也没有明确谁来负责。这种不平衡潜藏着另一种人口风险的加大。

人口发展过程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因此各方面人口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出生和生育是人口发展中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方面的认识迷茫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判断和估计。如上所述，近20年来高估出生漏报和过度调整出生数，积累起来就意味着少儿人口数量的高估，并且进而导致总人口数很可能也被高估。这些高估虽然并不影响老年人口数，但是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低估。而我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其实主要不是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996年起开始提供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并且从2006年起又增加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然而，笔者发现这些公布的老齡化统计指标与各年人口变动调查的年龄结构数据直接统计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图2）。统计公报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比实际调查结果低1个多百分点，比如统计公报2008年底的比例值为8.3%，而相应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计算值则为9.5%。如果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话，统计公报的2008年底指标为12.0%，比相应实际调查结果（14.0%）低2个百分点。并且，两者之间的差别产生于2000年以后。

[1] 郭志刚：“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2期；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图2 统计公报与人口变动调查的老年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

(1)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09年。

(2)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9年。

(3) 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财务司2002年（TFR=1.8）预测结果引自庄亚儿、张丽萍：《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年，第193-196页。

图2还提供了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财务司在2002年按总和生育率为1.8做的人口预测结果。可以看出，统计公报提供的老年比例虽然比其略高，但仍可视为与该预测结果十分接近。所以，无论统计公报的老年比例是在人口变动调查结果基础上调整出来的，还是直接来自于某种人口预测，之所以与人口变动调查结果之间有如此显著的差异，都不外乎与上述生育率约为1.8的估计有关。由此可见，以往对“出生漏报”所做的过度调整，亦会导致总人口数偏大和老年人口比例偏小。尽管近年人口变动调查存在少儿人口和青壮年人口漏报，但笔者认为，当前实际老年人口比例应当处于统计公报和人口变动调查结果中间，而按1.8生育率假定预测的老年比例则一定是显著偏低的。

所以，即使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国家权威人口统计指标，也只是提供了人口现状和趋势的大体信息，并不意味着能够很好地反映人口现实。根据笔者对历年统计公报各人口指标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也经过几次明显的调整，并且这种调整往往只是针对个别指标做出的，显然背后并没有严格、详细的人口推算和统计调整，因为在历年公报人口统计指标之间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一致，而且与实际调查结果之间差异很大。

当前人口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认识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做调查研究，并且要多做几乎对策准备。如果对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已经低估的话，那么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更具前瞻性的研究。

四、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要遵循两条基本的要求：一是要促使人口逐步走向自身的均衡发展，二是要使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相协调。这两条都是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是，这两个要求之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并不是天然一致的，尤其在实际上这两个原则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比如，资源环境生态要求人口要更少一些，而人口均衡发展却要求不能长期处于过低生育率中，否则既会导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亦会增大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风险。

以往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无不强调人口发展的这两个基本要求，但大都以“既要……也要……”进行表达，并不明确回答当它们之间有矛盾应当怎么办。然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不应当、也不可能真正回避这个矛盾。其实，面面俱到地罗列各种人口问题和各种原则并不能自动产生解决矛盾的清晰思路。这时就应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不是固定的，它们之间会随着不同时期而发生转化。

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首先起因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又逐渐吸收了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转向强调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压力。采用人均指标来反映经济、资源环境及其他方面的状况，可以反映出各个方面所体现的人均水平或人口压力，所以这种人均观念在以往计划生育宣传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人均观念的普及也体现出在以往大力控制人口时期中其实人口均衡发展要求是基本服从于人口与经济与其他方面协调要求的。比如，提出独生子女政策显然并不符合人口均衡发展的要求，只是因为当时人口数量增长问题极为突出和尖锐，并且也因为当时的统筹协调中几乎也只有人口数量控制更具可操作性。

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同时也进入了老龄社会。因此，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要求已经上升为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即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人口数量问题的重要性。它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往的人口控制实际上只是人口增量（出生）控制，而且已经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成功的前提是以前生育率很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但是现在的生育率（不论其到底是1.8还是1.5）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这标志着生育率转变不仅已经过正，而且已经过度，所以生育率已经没有潜力、而且也不应该再继续下降。尽管人口还将有一段惯性增长，但到达人口峰值已成定局。所以，未来的人口增量已呈刚性，没有什么紧缩余地。这就意味着，今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将主要依托于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保护和治理。

第二，过低的生育率之所以不能长期继续下去，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严重违反人口自身均衡发展要求的。所以，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必须及时地从以前矫枉过正的状态转向正常状态，即果断地调整计划生育取向，将过低的生育率转向更替水平，以免导致人口结构方面的更大损伤。也就是说，应当尽量避免治好一个重病又带出另一个重病。

第三，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人口压力仍将在中国长期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往虽然能够对人口增量加以一定控制，但人口总量问题却要作为历史遗产来继承和对待，即使需要调节也只能从长计议、徐而图之，采取更为和缓的措施。换句话说，对付急症（人口高增量的限制）可以下些猛药，而对付慢性病（人口总量限制）则要靠长期的治疗和调养，过急了反而可能导致伤筋动骨。这里的过急或过度的衡量标准就是生育率更替水平。

如果对当前人口发展这种阶段性变化和主要矛盾的转化认识不清，很容易产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并且会简单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未来人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实际上，人类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至今仍然是很欠缺的，虽然大家早都知道人口发展的周期长、惯性大的特点，但是以前说的是人口正增长惯性，然而与低生育率相联系的却是一种人口负增长惯性。所以人口问题的解决要有非常长远的规划，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不能仅仅将人口视为一个数字、一个分母，必须要看到这个数字背后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是亿万计的个人和家庭及他们的生活，是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总人口数只是人口一个方面的特征，人口还有结构、分布等其他方面的特征。其实，人口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生态、资源、环境，也必须加以保护，人口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否则同样会产生人口安全方面的巨大风险。

近两年有少数人提出要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主张在农村也要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主张者显然一是并不了解人口发展规律，二是并不了解当前人口实际状况，便做出了主观价值判断。其实，类似的主张在30多年前就有，甚至这种城乡一刀切的政策也曾一度付诸实践，但后来因出现问题太多而被终止。也就是说，即使在以往人口高速增长条件下，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也行不通，因为它既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人口发展规律。1980年代中期以后，计划生育工作采取了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指导的原则，并形成了稳定至今的现行生育政策。所以，此后的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都主要集中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上，而对更长远的人口战略的讨论反而有所减少。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中就已经说明：“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实际上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生育在特定一段时期中所采取的特殊策略，而不是计划生育的本质。但是，多年来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少模糊观念，在宣传、研究和工作中经常将独生子女政策或现行生育政策等同于计划生育国策。应当明确，计划生育是大政策，而独生子女政策或现行生育政策虽然亦被称为政策，实质上只是计划生育在一定时期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

在1990年代，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对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筹划变得日益迫切了。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了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想，“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从人口学角度讲，要想使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就应当取一个略低于更替水平的适度生育率。

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显然受到2006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的误导，因而针对“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此后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判断，现在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并提出新的人口目标是“全国总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左右，未来30年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并认为这就是“适度低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相对于以前只笼统谈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不足，新提出的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足之处则是判断生育水平和制定新人口目标时显然并未考虑生育率真很低的可能性及其相应风险，而且对1.8水平就是适度生育率方面也缺乏认真细致的论证。

如上所述，就当前的人口发展阶段而言，问题实际上已经从人口增量限制正式转入人口总量限制。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应不应当缩减，应当怎样缩减，同时也就是要不要缓解和怎样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问题。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人口决策问题。而在这一方面，研究基础是相当欠缺的。别的不说，我们连实际人口状况的把握都很不足。正是因为如此，以往绝大多数人口预测中普遍存在一种片面性，由于对低生育可能性考虑不足，所以没有充分反映出未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骤减、人口负增长等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至于要不要采取减少人口总量的问题，已故著名人口学家刘铮教授在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不同意减少人口的战略”，并认为“零增长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1]即使是在今天，刘铮教授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理论视角、分析方法及其许多结论与观点都仍然很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学习、思考和借鉴。

五、低生育率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

总和生育率除了用于不同人口之间和不同时期的对比外，还能够反映出当前这种生育水平对人口长期发展的影响。比如，经常提到的更替水平就是指能够保持未来人口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所以总和生育率水平自身具有一个人口再生产的“内在”平衡尺度。

为什么要研究人口“内在”发展趋势？它和一般所说人口发展的差别在哪里？这里，我们用微观家庭例子做简要说明。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随着第二代夫妇的生育，家庭规模就会扩大，原因在于新一代的出生与老一代生存并行不悖，所以三代同堂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但是，老一代终将会死亡，所以从家庭规模长远趋势看，第二代夫妇到底生几个子女才是主要决定家庭成员更替和家庭规模变化的“内在”因素（忽略寿命变化的影响）。微观家庭发展其实是宏观人口发展的缩影。在反映当前人口发展时，就相当于着眼于家庭中的所有成员。而在分析未来趋势时，就不再看已经与生育无关的老一代。由于人口存活的生命周期远远长于代际生育周期，这就是人口发展具有惯性的自然基础。重要的是，人口发展的周期长、惯性大，因此人口决策要有前瞻性，决不能仅仅依据现实中人口是否达到零增长，必须提前考虑更能反映长远趋势的“内在”指标。

根据人口学的稳定人口原理，长期延续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导致人口发展必定将逐渐趋于稳定的零增长。自然，长期稳定在高于更替水平之上的某一生育率时，未来人口必将趋于保持在与之相应的某一正增长率上；当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时，未来人口将趋于稳定在某一负增长率。这种由于长期保持某种固定不变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必定最终会导致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不变，它们可以用于预告人口趋势，通常将其称为“内在”人口变化率，以示它们与实际人口变化率的区别。

[1] 刘铮、张象枢、李建保等：《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4。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判断只能对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的临界点上下时进行趋势方向的判断，不能用于其他更具体的生育水平判断。对于我们面临的低生育之谜，至少可以涉及到三种生育率水平：更替水平生育率，1.8水平的生育率，实际可能更低的生育率。

笔者通过对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不同来源数据的分析认为，即使考虑调查存在18%的出生漏报，2000年时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也很可能还不到1.5。^[1]对于这种很低的生育率水平估计，至今仍有不少同行认为“根本不可能”。但是随着更多新的人口调查数据的获得，笔者不断地对2000年的生育率进行重新估计，检验结果是上述估计至今并不能被证伪。但是这里不必过于拘泥这种很低生育率估计的准确性，重要的是说明不同的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发展长期趋势的不同影响。

普瑞斯坦 (S. Preston) 等人根据稳定人口原理推导出一个很有用的公式，可以直接推算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长期不变时未来人口的内在增长率 (r) 的变化量 (Δr):

$$\Delta r = \frac{\ln(\text{TFR}(2)/\text{TFR}(1))}{T}$$

其中，TFR (1) 和 TFR (2) 表示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水平，T 被称为平均世代间隔，也就是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2]在全球范围中，其值一般处于26~33岁之间，众数约为27~28岁。在中国，以前由于妇女生育数量很多，生育期拉得很长，因此平均生育年龄接近30岁；而随着计划生育，妇女生育数量迅速减少，生育期被显著缩短。近十几年来，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约为26岁。于是，我们便能推算出不同的低生育率究竟对未来人口发展意味着什么。

要进行生育率分别在2.1、1.8及1.5水平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又涉及到三种不同的差异：即1.8水平与更替水平之间的差异；1.5水平与1.8水平之间的差异；以及1.5水平与更替水平之间的差异。

首先，尽管这三者之间依次相差0.3，但是实际上从不同总和生育率上变化同样的幅度其实能导致未来人口增长率不同的变化。普瑞斯坦等人指出：对内在增长率的影响幅度，并不取决于不同TFR之间的绝对差值，而是取决于TFR下降的比例关系（即上述公式中TFR (1) 与TFR (2) 之间的比值）。也就是说，TFR从6下降到4与TFR从3下降到2，这两种生育率下降的幅度虽然不同，但由于其前后变化比值都同样是1.5，导致内在增长率的变化量却是相同的。这意味着，随着生育率向

[1] 郭志刚：“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郭志刚：“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第4期。

[2] Preston, S.H., P. Heuveline, and M. Guillot, *Demography: Measuring and Modeling Population Processe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153.

更替水平的下降，单位下降幅度对降低人口内在增长率的作用是不不断递增的。

在与更替水平 2.1 相比时，1.8 生育率的比值为 0.83，而 1.5 生育率的比值为 0.71。由于更替水平生育率对应的人口内在增长率就是 0，所以用上述公式计算的内在增长率变化量本身就是它们对应的内在增长率，即 1.8 生育率对应的内在增长率为 -0.7%，而 1.5 生育率对应的内在增长率则为 -1.3%。利用这两个内在增长率计算的变化量或直接按上述公式计算出结果相同，即 1.5 生育率相对于 1.8 生育率所导致的增长率变化量为 -0.6%。

全人类以往经历的都是人口正增长，所以以往常用上述稳定人口模型计算人口倍增时间来反映人口内在增长率的含义。而面对未来人口缩减时，亦可以改用人口减半时间来反映人口内在负增长率的含义。摩根和泰勒 (P. Morgan and M. Taylor) 曾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一些低生育率国家数据计算过相应的内在人口负增长率及其人口减半时间。其中亚洲只计算了日本与中国：按日本 1.33 的总和生育率，相应的内在增长率为 -1.5%，其内在人口减半时间为 46 年；按中国 1.70 的总和生育率，相应的内在增长率为 -0.9%，人口减半时间为 75 年。^[1]由此可知，他们按 1.7 计算的内在增长率比上述我们按 1.8 计算的绝对值更大，即表明生育率越低未来人口负增长越快。在他们的计算中，均假定各国的平均世代间隔为 30 年。但是，中国的平均生育年龄在低生育率国家中算是很早的，这种差异会导致内在增长率结果的绝对值略微偏小。

所以，如果按中国平均世代间隔为 26 年来计算，1.5 的生育率对应的人口减半时间为 54 年，而 1.8 的生育率对应的人口减半时间则为 117 年。由此我们看到，1.8 生育率和 1.5 生育率虽然都可以笼统称之为低生育水平，但它们对未来人口发展影响的差别居然如此之大。所以实际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是研究人口战略时极为重要的基础数据，就是一时搞不清楚，也必须充分考虑很低生育率的可能性及其风险。所以，人口统计陷入怪圈令人深感忧虑，因为这就相当于“打左灯往右拐”，很容易导致风险被遮掩。

还必须说明，以上仅仅是借助稳定人口原理所做的理论探讨，它忽略了实际人口结构的影响。如果将实际人口结构的影响也纳入考虑，就不是一个公式所能推导的了，只能进行真正的人口预测。正如以上所举的家庭规模变化的例子那样，虽然家庭规模变化的长远趋势可以仅仅考虑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之间的比例关系，但是要反映家庭规模的实际变化还必须考虑到老一代人的存活情况。那么，现有中国人口

[1] Morgan, S.P. and M.G. Taylor, "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6, 32, 375~399.9

结构对未来人口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呢？由于人口转变速度太快，所以现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非常畸形。那么新中国建立以后三次出生高峰人口，现在都处于20~60岁。2009年，新中国的同龄人正好60岁，跨入老龄阶段，其他出生高峰人口将在今后40年内相继进入老龄。这些年龄组的人数要远大于1990年以后每年的出生人数，就意味着未来祖国人口大家庭中的老爷爷老奶奶将相对特别多。也就是说，现有人口结构的影响将导致21世纪前半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特别快，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会非常严重，继而又会导致21世纪后半期人口总量削减也会十分迅速，所以实际人口缩减速度肯定会大大快于以上推算的内在人口减半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生育率至少回升到1.8水平不过是人口安全的最低要求，并且生育率还应当继续向更替水平适度回升。这种生育率回升并不代表人口形势严峻，反而是确保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过度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

六、结 语

中国人口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生育水平，但是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以后便失去了对实际生育水平的把握，陷入一种人口统计怪圈，至今已经将近20年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以往人口规划中一直沿用1.8生育率口径，均没有考虑生育率真很低的可能性。至于将1.8生育率作为今后30年的适度目标生育率也显得过于草率。这两种判断都同样产生于担心人口发展失控，然而又都忽略了生育率过低也会对未来人口发展形成另一种的风险。

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能否解决好，尤其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则取决于现在的判断和决策。▲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左学金

【内容提要】本文在综述马尔萨斯以来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人口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的和不确定性的。1990年代以来,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在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地区)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人口超低生育率的担忧。中国人口态势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中国目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应该及早作出调整。

关键词: 人口增长 生育政策 经济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09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出生率为12.13%,死亡率为7.08%,自然增长率为5.0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很大,但是增长速度在逐步放慢。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在较长时间内以较快速度增长。如根据葛剑雄的推测,中国人口从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的约1.2亿人增加到1850年的4.3亿人,在约20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3亿多人,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被称为人口增长的奇迹。^[1]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49-1987年这短短的38年中,中国人口从5.42亿增加到10.93亿,翻了一番。但在其后的22年中(1987-2009年),中国人口仅增长了22%,平均年增长率不足1%;近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更进一步下降到约0.5%。据王丰、郭志刚和茅卓彦的研究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5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1]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年前后达到约 14 亿人口的峰值后开始下降。^[1]届时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

中国长期受人口压力的困扰，所以对于人口增长问题，从政府、学界到公众，始终心存忧虑。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或“民工荒”以及针对“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等问题讨论的展开，对放宽生育控制政策的呼声有所加强。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放宽生育控制，中国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有人认为，生育控制政策非但不能放宽，还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更快增长，今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才能更容易解决。这些想法的背后，是对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的不同认识。本文试图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和中国的实际，对生育率、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分析讨论。

一、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探讨

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人口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不同时期争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有些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有些则强调积极影响。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问题的讨论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发表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先验假设是，粮食生产充其量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其结果是产生大量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只能以饥荒、瘟疫、战争等消极手段或独身、节欲等积极手段来消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隐含：1）人口增长受到粮食供应或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当因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失衡时，只能通过消除过剩人口的办法实现平衡；2）从动态来看，如果经济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长会将消费水平重新拉回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谓的“贫困陷阱”。一方面，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尔萨斯的假设也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实际上，假定技术（包括制度安排）不变，“马尔萨斯约束”还是存在的。在相当长的历史内，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都相当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1] 王丰、郭志刚、茅卓彦，“21 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 年第 6 期。

人口增长受到了土地和食物等资源的约束，或者说“马尔萨斯约束”确实存在。不过技术进步会放松“马尔萨斯约束”对人口增长的限制。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可不断增长，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不断提高。

1950年代以来，当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因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加速增长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如果说马尔萨斯本人在分析中所强调的是食物供应和有限土地资源的话，这一时期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传统的研究所强调的是人口对生产性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当数梭罗（Solow）的经济增长模型^[1]和寇尔与胡佛（Coale and Hoover）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2]。

经济增长模型假设一个代表整个经济的生产函数，它以劳动力和资本为投入，且假定两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每个劳动力的产出由资本/劳动力比率来决定。在稳态经济增长（即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均不变，从而资本/劳动力比率也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

寇尔与胡佛的印度人口经济增长研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的先驱。他们构造了一个增长模型来模拟印度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口数量和增长率是外生的。模型模拟了1956–1978年间各种人口增长率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导致较快的人均收入增长。

在上述两类模型和后来的类似模型中，人口对资本/劳动力比率的提高有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较快的人口增长会使居民家庭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此外，人口增长还会造成社会的非生产性投资（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投入的增加，从而导致生产性投资的减少。最后，新增劳动力还会“稀释”人均投资额，因为对于给定的投资额来说，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将意味着每个劳动力所得到的资本追加量的减少，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慢。

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一部分这类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配第和斯密首先论述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库兹涅茨（Kuznets）认为，较多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相关，而后者是许多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专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假定外贸在经济中的作用有

[1]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1956.

[2] Coale, A. J. and Hoover, E. M.,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限)。^[1]西蒙 (Simon) 则指出, 上述关于规模经济的好处对公共投资 (如交通系统) 同样适用。^[2]库兹涅茨和西蒙还对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必然会导致家庭储蓄下降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们指出, 家长可能用减少消费或闲暇、而不是减少储蓄的办法来补偿用于子女的开支。而且年轻型人口可能有利于储蓄, 因为在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中, 劳动人口远超过退休人口, 从而劳动人口为退休准备的储蓄额将超过退休人口在这类储蓄中的提取额。

另一些研究则对马尔萨斯主义分析所假定的技术进步的外生性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 库兹涅茨和西蒙认为资源短缺将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导致较快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这些进展将促使食物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鲍瑟若普 (Boserup) 提出的“人口推动假设”认为, 人口压力可以推动和促使人们采用已有的新技术, 或者说, 人口变化可以推动技术进步。^[3]例如在历史上, 当人口稀少时人类所采用的是多用土地、节约劳动的技术 (如游牧业), 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则采用节约土地、多用劳动的技术 (如农业)。她所强调的是人口变化对生产技术变革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这一重要的作用机理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分析中完全被忽略了。

近年来,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上。这类研究的较早的代表性文献有罗马俱乐部的研究。^[4]但是实际上, 即使比较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也承认, 生态环境受人口、富裕程度 (人均收入水平) 和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影响, 人口只是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例如, 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5%, 但是美国的能源消耗却占全球能源消耗的 22% 左右。再例如,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不断放慢, 但是能源消耗却迅速上升。对实证数据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 在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 105.7%, 同期人口仅增长了 4.8%, 而人均消费则增长了 96.3%, 其余 4.6% 是两个增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 是通过实行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来控制人均消费量的增长。

[1] Kuznets, 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 Society*, 111, 1967.

[2] Simon, J., *The Effect of Income upon Fertility*, Chapel Hill: 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 1974; Simon, J.,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opulation on Agricultural savings in irrigation system”,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57, 1975.

[3] Boserup, E.,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Chicago: Aldine Press, 1965; Boserup, E.,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study of long term tre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4] Meadows, Donella H.,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实际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前者影响后者的单方向的关系，而是两者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许多人口经济理论试图解释人口增长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理论试图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如何影响生育率。这方面的理论，包括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和贝克尔（Gary S. Becker）等人提出和发展的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1]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生育孩子的成本包括父母用于孩子的生活、医疗和教育等费用，以及为养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和因此减少的货币收入或闲暇等。对父母来说，孩子的效益包括向家庭提供劳力和经济收入、老年保障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效用。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部分家庭功能（如养老保障）的社会化，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而效用却不断下降，从而减少了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要，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一发展趋势，不但在发达国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看到。

当然，此外，“家庭计划”和避孕药具的改进和容易获取，使育龄夫妇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子女数和减少“不想要的孩子”（unwanted children）。

对于经济发展可以影响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生育率下降是世界性的趋势，不但在政府实行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的中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在许多没有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包括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伊朗等，也出现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

二、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需要实证的支持。迄今为止，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库兹涅茨分析了战后4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口增长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不存在确定的相关关系。^[2] 伊斯特林（Easterlin）将37个发展中国家按其在1957-1958年到1963-1964年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分为六组，然后检查这六组国家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1] Leibenstein, H. A., *A Theory of Economic-Demograph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Becker, Gary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75 (299), 1965.

[2] Kuznets, 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 Society*, 111, 1967.

率的频率分布。^[1]他同样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支持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笔者曾对中国分省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作出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分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一致的相关关系。^[2]

上述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可以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在宏观水平的分析上，两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抵消。例如在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会减少人均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的占有量，从而对人均收入产生负作用。但与此同时，人口对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压力，可能会促使农业劳动力向节约土地但边际收入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由此可能导致人均收入的增加。

当然，除了人口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经济政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毫无疑问，这些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然而，正如伊斯特林所指出的，如果人口增长的作用相对于其他因素更加重要的话，即使在上述的简单两变量模型中这种影响应该也能反映出来。

近年来中国学界与公众都比较关注“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生育率下降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少年抚养比下降而老年赡养比还没有明显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高，从而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研究发现，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其经济高速增长期都与人口红利期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是在生育率从高到低变化的动态中实现的，而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会产生人口红利，只能逐步消耗和终结人口红利。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期恰好相吻合。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正是中国1950和19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将会被继续束缚于农业部门，无法得到有效使用；而改革开放使这些劳动力得以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部门，以及从农村转向城市，从而使他们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得以发挥出来。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潜力与改革开放时期恰好相吻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的重要“秘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中国晚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已经进入尾声，中国经济就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众

[1] Easterlin, R. A., "Effect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9, 1967.

[2] 左学金：“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海《人口（季刊）》，1992年第1期。

多确实不一定是坏事；在改革开放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对吸引外来投资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1950年代和“文革”时期，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当时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不足的国家，而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极其有限，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时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困难；或者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不符合中国资金短缺而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1]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这种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将世界各国按人口生育率从高向低排列，可以发现高生育率国家都是贫穷国家，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的国家却有不同的收入水平。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不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例如印度2007年的总和生育率是2.8，大概相当于中国19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但是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从2006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但是日本经济却度过了“失去的20年”。日本和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地区）先后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严峻挑战，引发了对低生育率的担忧。如果说过去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重点，在于分析探讨过快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关注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三、对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政策的反思

到了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使人们对“人口爆炸”的担心有所缓和。人们一度假定，当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时，会反弹到更替水平。但是在1990年代，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在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地区）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新的担心。这种担心的最直接的理由，是长期和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将危及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信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作为封建思想来加以批判，但对于一个民族整体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出于对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的担心，早在20多年前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9年11月第2版。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就组织专家研究人口低增长的经济后果问题。^[1]美国的兰德公司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 都对低生育率问题及其影响展开研究。^[2]持续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的更加近期和迫切的后果, 还不是物种延续的问题, 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如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可导致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缩减, 以及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可加重养老和社会保险的负担; 老年人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成本; 可严重削弱向需要照顾和护理的老年人提供帮助的能力, 等等。

从1970年代以来, 中国开始了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的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1960年代的高生育率阶段, 在这一阶段, 除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外, 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大约6个孩子。第二个阶段是1970—198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波动的阶段。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的短短10年中下降了一半以上, 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左右孩子下降到生育2~3个孩子, 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生育率下降。紧随其后的是1980年代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上波动。第三个阶段从1990年代初开始, 中国妇女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 并持续走低, 尽管目前对于中国生育率的真实水平还存在很大分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统计数据, 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而根据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基于抽样调查的估计, 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从数据收集单位的“中立性”来判断, 笔者个人更倾向于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但不管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统计, 总和生育率都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2.1)以下, 或者说下一代人的数量已经不足以“更替”上一代人的数量, 且不说中国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约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还会要求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更高一些。^[3]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只是人口的“惯性”增长而已, 未来出现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已不可避免。但人口负增长, 并非如有人所设

[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Ques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2] Grant, Jonathan, Stijn Hoorens, Suja Sivadasan, Mirjam van het Loo, Julie DaVanzo, Lauren Hale, Shawna Gibson, William Butz, *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Ageing: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RAND Monographs, 2004.

[3] 假定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是105, 即每100个女孩有105个男孩, 在这种情况下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目前实际的出生性别比是120, 那么大约在120个男孩中, 约有15个男孩会因为找不到配偶而无法正生育, 或者说会被“浪费”掉。这样出生性别比畸高情况下的220个孩子(其中女孩和男孩分别是100个和120个)的生育功能只相当于出生性别比正常情况下的205个孩子(其中女孩和男孩分别是100个和105个), 所以需要将更替水平生育率向上调整到 $2.1 \times (220/205)$, 约为2.25。

想的那样将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根据笔者和杨晓萍的研究，低生育率和人口低增长、负增长在某些方面（如就业、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另一些方面（如国内消费需求、社会保障基金和公共财政，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等）则将形成严峻的挑战。^[1]当然，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对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还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证数据和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

根据上面的讨论，对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问题，我们建议“中庸之道”的生育政策取向，即过高的生育率与过低的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应该努力避免。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致力于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上下。

1990年初期以来，中国在生育政策没有收紧的情况下，生育率却进一步下降，这种下降可主要归因于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变化。根据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经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易扭转。如果说过去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的生育率过高和人口增长过快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担心中国生育率过低和人口负增长太快太深。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口态势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2]这些变化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提法，尽快调整中国的生育控制政策。▲

[1] 左学金、杨晓萍：“我国人口——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与生育控制政策”，载曾毅、顾宝昌、郭志刚等：《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2] 同[1]。

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

都 阳

【内容提要】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也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由于迅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政策的共同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但由于生育率水平下降迅速,相对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短,并行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低生育率水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已经显现,集中体现为人口结构变化成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因素。因应人口转变和劳动力市场转折,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政策都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 人口转变 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政策

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人口结构的快速变迁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人口因素历来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也是多样的,但其中通过劳动力市场发生作用是一条重要的路径。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以及人口因素所推动的劳动力市场转折,并讨论这一转折时期的相关政策调整。

一、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人口因素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因素都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人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会财富的主要消费者，也正是人们的消费构成了社会的最终需求。从世界范围和历史变迁的双重视角观察，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有很多争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梳理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脉络，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人口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认识基本上是消极的，人口增长“危害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强调所谓的“人口爆炸”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很强的负面效果。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McNamara）阐述的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他认为，人口增长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亚于核子战争。同样的论断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体现。例如，1971年美国科学院发布了题为《人口快速的生长：后果和政策涵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人口增长的结果乏善可陈，而且列出了17条原因，解释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更小的人口规模中获益。

这种理论上的思潮，也主导了那一时期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走向。据联合国的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有127个国家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计划生育，涵盖了当时世界人口的94%。^[1]

然而，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完全消极的认识，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其后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两类国家的分野，一些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很多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沼不能自拔，但它们的人口数量特征却可能很相似。由此，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悲观的“危害论”提出异议。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更加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物质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并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同样是美国科学院，也同样是就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发表的研究报告，15年之后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差异。在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中，美国科学院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认为：（1）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2）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3）以前认为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应该归因于其他因素；（4）人口因素的作用在于有时会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使其症状更早、更明显地得到暴露。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代表了人口增长“利弊论”的基本思想。

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享有红利而迅速发展，更使人们认识到

[1] La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简单地以人口多寡来衡量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人们越来越发现，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原因，要用更广泛的视角，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人口数量上。这其中，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处于基础性地位。

尽管对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浩如烟海，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枚举也难以计数，但人们越来越达成共识的是，合宜的制度条件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科斯的研究成果为大家所推崇的原因。有了这个基本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长期以来，有关人口数量是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的争论莫衷一是。但我们的确可以发现，现实世界中既有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好的国家，也有人口爆炸、陷入贫困陷阱难以自拔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解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首要地将其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寡。类似的是，印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恰恰是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事情。

有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合宜的制度环境，人口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人力资源。人口因素就可以因此而转化成人口红利。经济学揭示了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增加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资本和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增长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会趋于下降。相反，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东亚四小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造东亚奇迹，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或许就是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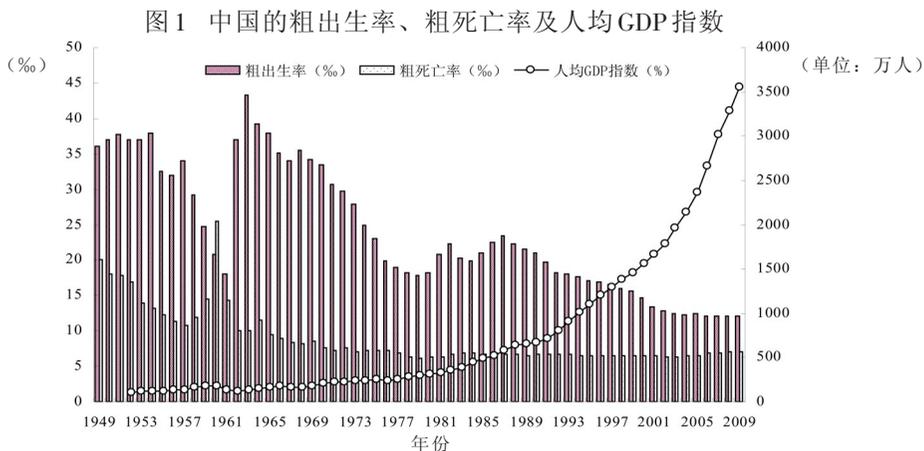
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模式，贫困与低增长也相伴其中。积极化解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消极影响，对这些国家而言或许是必须的，但说到底，摆脱贫困陷阱需要从多方面努力，绝不是通过简单的人口调控就可以自然地走上康庄大道的。

二、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

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较之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人口因素在短期内比较稳定，从中长期看也表现出非常稳定的趋势性。也正因为如此，人口因素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预期也非常稳定，从而使我们可以比较可靠地预测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因素和其他短期的宏观经济指标不同，由于具有较强的趋势和惯性，在短期、乃至中长期内它都难以改变。这越发使人口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一个长期重要因素。

我们首先来观察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从图1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粗死亡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出生率水平的下降则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在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之后，出生率经历了短暂的增长，随即开始下降，到70年代末才停止。生育率的第二次持续下降开始于1987年，随后，生育率下降的势头一直维持到现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2009年根据可比价格（1952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是1952年的35.6倍。经济发展和出生率变动明显呈现出一个剪刀差格局。这说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较之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低生育率水平。我们知道，人口转变一般都需要经历几个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一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第二阶段；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三阶段。而人口转变所持续的时间以及人口转变乘数是度量人口转变过程的两个重要的内容。前者是指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开始到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结束所经历的时间，后者则是指人口转变结束和人口转变开始时人口数量的比率。欧洲国家比较早地实现了人口转变，其转变过程也验证了前面所描

述的几个阶段分布的规律。一般来说，一旦生育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则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但欧洲国家之间在具体的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如表1所示，法国较之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持续期更长，但其人口转变乘数也更小。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进行比较，则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比较大的人口转变乘数。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其人口转变乘数为2.46，与多数欧洲国家相差无几。中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过程，并具有比较低的人口转变乘数，和中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同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表1 中国和部分国家（地区）人口转变过程的比较

国家或地区	转变开始和结束	转变持续期(年)	人口转变乘数
瑞典	1810-1960	150	3.83
德国	1876-1965	90	2.11
意大利	1876-1965	90	2.26
苏联	1896-1965	70	2.05
法国	1785-1970	185	1.62
中国	1930-2000	70	2.46
中国台湾	1920-1990	70	4.35
墨西哥	1920-2000	80	7.02

资料来源：转引自马西姆·利维巴茨：《世界人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然而，对于中国人口转变因素的分析，人们往往着重于中国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对于抑制人口增长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雷伟立和弗里德曼（Lavelly and Freedman）就指出，早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严格的生育计划之前，生育率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导致这一时期城乡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1]但由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政府的生育政策初衷是一致的，一些政府研究报告更倾向于认为，生育政策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推断“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出生了2.5亿人口”。^[2]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育率下降的计量经济分析则表明，19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子女抚养成本的上升，对于生育率

[1] Lavelly, W. and Ronald Freedma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y*, Vol. 27, No. 3, 1990, 357~367.

[2] 国家计生委课题组：《计划生育投入与效益研究》，2000年，影印稿。

下降越来越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1]

由于人口转变进程的不断演进，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从1960年代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少儿抚养比逐渐下降，老年抚养比则逐步上升，到目前为止，总抚养比仍然在下降。到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3%，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5%。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仍然较高，但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表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总抚养比
1953	36.3	59.3	4.4	68.6
1964	40.7	55.8	3.6	79.4
1982	33.6	61.5	4.9	62.6
1990	27.7	66.7	5.6	49.9
2000	22.9	70.2	7.0	42.6
2009	18.5	73.0	8.5	36.9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摘要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的人口转变很快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口的总体生产性不断增强，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的比重，相应地，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1970-1995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2.0/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2.0/4.1）。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口年龄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进入了人口红利阶段：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将面临转折点。总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42.6%

[1] 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0.4个百分点。如果把前期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人口转变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在1/3左右。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1]

三、人口转变与劳动力市场转折

虽然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人口转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其中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人口转变成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力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取决于诸多因素，从两类最主要的力量看，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就业需求，而人口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

当然，除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与结构以外，劳动力供给也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工资水平、参与率和失业率等。因此，当劳动力短缺出现，并由此推高劳动力价格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也会进一步进行数量调整。工资水平的提高，原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可能由于市场工资高于保留工资，而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因此，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增加，失业率水平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失业人群成为劳动供给的来源。

相对于劳动参与率提升和失业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约束更具刚性。因为，人口变量是一个更稳定、不容易对短期的价格信号产生反应的变量。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我们可以估算今后一段时期内新增劳动力人口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该图中的两个时间点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1] 王德文、蔡昉、张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图2 2002–2030年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调查及预测（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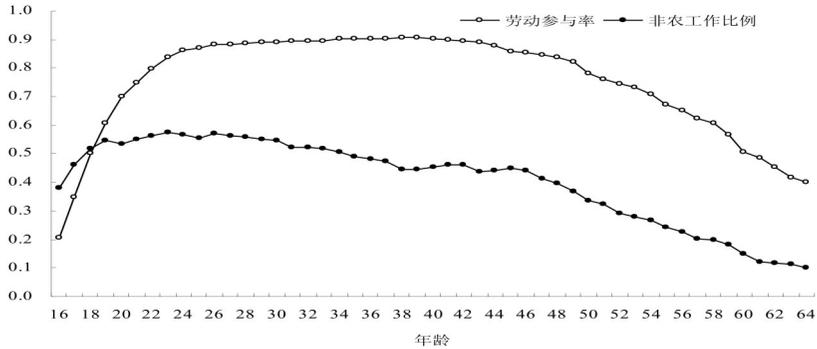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胡英、蔡昉、都阳：“‘十二五’时期人口变化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载蔡昉主编：《2010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其一，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到894万，并由此开始较长时期的单调下降的趋势。“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为741万。回顾整个“十一五”时期，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以外，其他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短缺状况总体上呈不断严重的趋势。

其二，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致出现在“十二五”结束之后。纵观整个“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较之“十一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312万。考虑到就学时间的延长而导致的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低的现实，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会对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加之中国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旺盛劳动力需求，我们就不难理解“民工荒”为什么愈演愈烈。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一局面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此外，由于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刚刚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具有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使16至22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处于较低水平，图3清晰地刻画了这一趋势。该图显示，16~64岁人口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曲线。2005年16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20%，而16~22岁年龄组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55%。图3的曲线是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绘制的，考虑到2005年以后高等教育扩张的趋势更为明显，目前，年轻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应该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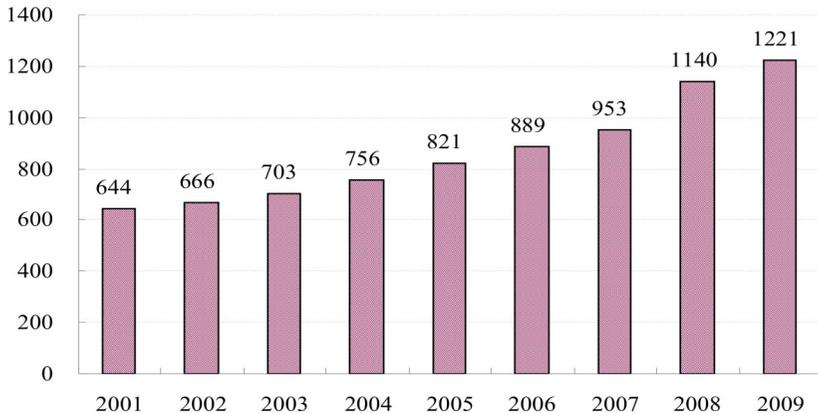
图3 2005年分年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是对劳动力增量的描述。增量分析的结果，解释了劳动力短缺为什么会出现在，以及是否由短期因素所主导。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供求关系的边际分析，并不是只针对农民工群体，而是从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进行观察。可以想见的是，由于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增量上的差异不断扩大，必然需要从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存量中弥补劳动力短缺的缺口。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构成看，劳动力供给的存量资源分别来自于两个部分。其一，继续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其二，挖掘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潜力。而只有当市场的工资率高于保留工资时，这两个存量部分的劳动力的供给才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持续上涨的原因。

图4 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单位：元/月）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

图4反映了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变化情况。历年的工资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为2001年不变价格。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农民工工资，在近年来处于快速上涨的趋势。尽管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2008年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仍然有近20%的增幅。^[1]2009年，农民工实际月平均工资为1221元，为2001年的1.9倍。考虑到农民工是劳动密集型就业的主体，以及其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产生推动作用。

四、人口因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

如前所述，由于人口因素具有很强的惯性，其变动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主要体现为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制约而引发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由于劳动力要素日渐稀缺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关系变化所诱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于农业劳动投入所面临的机会成本逐步增加所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

由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不可避免。制造业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是国际间可比较的指标，近年来该指标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据测算，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0.63美元，2008年已经上升到每小时1.44美元，上涨幅度为128.6%，年平均增长率为14.8%，高于同期的GDP增长速度。在人口结构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劳动力成本已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随着低生育率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效应进一步显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会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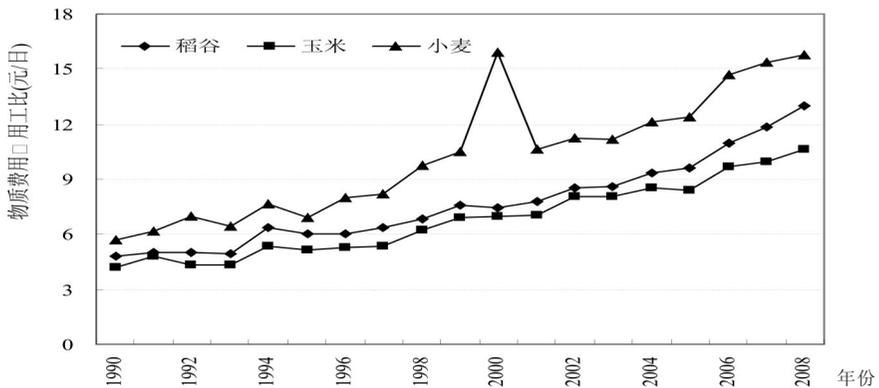
在面对劳动力短缺时，企业首先使用内涵的应对手段，如增加劳动时间、更多地使用工资相对低廉的外来劳动力替代本地劳动力等措施，来遏制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但很显然，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使用农村劳动力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因此，虽然小时工资率没有显著增长，但由于劳动力短缺所产生的成本上升的推动力已经存在并逐渐增强。我们也可以预期，在企业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短期潜力挖掘殆尽之后，中国有可能迎来劳动力成本的更为迅速的上涨。

[1] 2007年和2008年的CPI处于近年来的高位，也增加了工资上涨的预期。

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1]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过程是诱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首当其冲地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产生推动作用。而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总成本中劳动成本的比重较高，对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更加敏感。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上升会改变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关系，并推动经济结构向后者转化。

如果考虑国际经济关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也会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削弱，并有可能由此改变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也是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群体）的收入提高，又会增加消费需求，从而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

图5 主要粮食作物物质费用—用工投入比变化



资料来源：Wang (Wang, Meiyuan,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3, No.2,2010, pp.137~153)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 计算。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加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并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非农部门就业机会日益充分，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的收入迅速增加，也就意味着农业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会显著增加。相应地，农业中的劳动投入显得越来越昂贵，并由此引发农户更多地使用机械、化肥等物质资本

[1] Minami, Ryosh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Japan: An Assessment of the Kuznets Hypothe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2, 1998, 39~58; Minami, Ryoshin and Akira Ono, “Behavior of Income Shares in a Labor Surplus Economy: Japan’s Experi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29, No. 2 (Jan., 1981), pp. 309~324.

投入，以替代劳动投入。如图5所示，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断增加，农业中单位面积物质费用和劳动投入的比率也在不断上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农民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会在农业部门诱致新的技术变迁以及农业投入结构的变化。

由于农业中单位劳动所使用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将使中国的农业越来越摆脱传统农业的小农特征，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效率的提高将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一起成为改善劳动者福利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口结构的转变是推动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之一。

五、转型期的政策调整

人口转变及其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等转折性变化，人口规模将不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下降，这也相应地对应对老龄化和完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只有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人力资本积累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人口政策是与人口转变最直接相关的公共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控制人口规模对降低总抚养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得以迅速地进入人口红利期。然而，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完成，迅速进入人口红利期的负面效应（人口红利期短）开始显现。我们已经看到，即便在人口红利期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从人口因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人口总量规模，转化到人口结构是否合理。虽然我们很难估计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是否足以解决目前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但维系现行的政策则有可能加速人口结构的失衡。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政策在面临着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机遇。一方面，少儿抚养比的进一步下降，使得以正规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建设面临着更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及劳动力市场的转折对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是一种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现象，但是，一些公共政策领域改革的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供给潜力的发挥。其中，城市化政策是最主要的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依然明显，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地和工地分离，并导致他们在城乡之间往复。每

年春节期间的大规模民工潮，就是最直接的体现。由于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的有效劳动供给时间也受到影响。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资料，2009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工作时间是268天；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就业时间为9.5个月。^[1]换言之，如果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能够逐步消除，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稳定地居住和生活，平均每个劳动力能增加将近2个月的有效劳动供给。

此外，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逐步下降，产业升级也就不可避免。而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对劳动者的素质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反过来对产业工人的技能又提出新的要求。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继续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加强培训与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的结合，完善现有的培训体系以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有助于普通劳动者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挑战，也有助于企业更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

最后，需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激励劳动力供给。前面的分析表明，一旦劳动力市场上增量的劳动供给难以满足增量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就需要从现有的劳动力存量中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一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但已有的分析表明，由于受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农村的劳动力存量主要是低教育水平和年老的劳动力，维持新的劳动供给的可能性已经很小。^[2]而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却持续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中国5个城市所做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发现城市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从2005年的61%下降到2010年的53%。考虑到劳动力市场规制不断加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在这一时期不断提高，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可能对城市劳动力的劳动供给产生负向激励。▲

[1]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外出就业规模稳步扩大 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2010年。

[2] 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